

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及其钤印探析

A Study of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and Their Seals in 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y at University of Malaya

邱克威*

(KHOO Kiak Uei)

摘要

马来亚大学始创于1949年，而后1953年设立中文系。1953-1954年由创系主任贺光中二次赴日本与香港等地购置13万册中文书籍，其中不少古籍珍本；当时属于东南亚首屈一指，更自称海外名列第七的中文古籍收藏。1962年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与新加坡的新加坡大学正式分家，这批古籍主要由新加坡大学继承，仅几千册转移至马来亚大学。而自1962年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创办以来，社会亦捐献几千册中文线装古籍。然而可惜的是，1970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缺乏合理保存与管理，更无认识其文献价值的图书馆员，乃至终于部分损毁丢弃。目前所存亦仅其1970年代初之部分。本文从梳理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最初入藏一批珍贵古籍开始，以至现如今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古籍保存状况，分析其中个人与社会因素之影响及于一地一校图书馆古籍珍本的入藏与保存。其中不免各方因素环环相扣，纵其眼下毫不起眼，仍不应隐没当初之弘毅负重。而如今劫余幸存却仍无以妥善保存之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内约五千册线装古籍，唯有翻阅之际偶现的那一方方旧藏家之钤印还能多少勾勒当初的风光。

关键词：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古籍钤印、海外古籍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as established in 1949, while the Chinese Department was set up in 1953. During 1953-1954, the then head of department Dr Ho K C, purchased 130,000 Chinese books from Japan and Hong Kong, which comprised many rare collections. That made its Chinese collections the best in Southeast Asia, and even boasted to be number seventh in the world outside China. In 1962, University of Malaya and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ecame independent universities, and these rare collections mainly remained in Singapore, while a small portion was transferred to Kuala Lumpur. Since the setup of Chinese Department at th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1962, it has received donations of Chinese books from the society, including some rare collections. However, due to mismanagement and mishandling of these collections since the 1970s, in addition to the lack of library personnel with ample knowledge of the collection, many were destroyed or even disposed of. This paper chronicl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se rare collections in the libraries of University of Malaya,

* 邱克威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讲师，电邮地址：KiakUei.Khoo@xmu.edu.cn

and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and societal influences that shaped the resultant collections of libraries. These influences were interlocked such that even the present collection may not seem impressive, but still deep within laid the whole weightage of its historical journey. Presently these rare collections of around 5,000 volumes, which had survived the many destructive means, are still in need of a proper preservation. And it is only when flipping through the pages and occasioned upon the seals by previous owners of old that may yet flash by a glimpse of its past glory.

Keywords: University of Malaya, 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y, Chinese ancient books, Seals in ancient books, Overseas ancient books

一、前言

马来亚大学目前主要的中文线装古籍均收藏于扎巴纪念图书馆大楼（Za'ba Memorial Library）内的“东亚图书馆”，根据馆员所提供的目录总数为725种4619册；其中按类别分为四个分目：一、“民国前”为251种2145册；二、“民国后”为358种1677册；三、“鉴古堂藏书”为61种321册；四、“何克柔藏书”为55种476册。第一二分目乃以1912年为界按书籍年份分类，且其中“民国后”书籍也主要是1940年以前，1940年以后的共87种；第三四分目则是按照1960年代以后本地社会人士的特殊捐赠分别编目，其中均为线装古籍。¹

实则2016年4月至9月期间数次在马大图书馆内的查阅过程中，另外补充了41种306册；包含6种79册为“鉴古堂藏书”，以及“民国后”6种24册。²于是按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马大东亚图书馆所藏中文线装书总数应为766种4900册。而以中文古籍界定

¹ 本文所据马大东亚图书馆所藏线装书目录乃2016年4月时任馆员之打印本，据悉其后再无修订。2016年4-9月我在东亚馆协助检查目录所增补修正的内容并未编辑整理。本文写就后经马大图书馆的三位中文书籍馆员传阅，包括前后二任东亚图书馆馆员吴雪雯与罗立勤，以及马大图书馆副馆长许爱萍。

² 本文所补书种及册数，如上注所述并未经图书馆编辑整理。今按其馆内目录分类，罗列如下：一、“民国前”有：同治10年《字学举隅》一册、光绪19年《戴文节画记》、光绪19年《梅窝词钞》一册、嘉庆元年《龙威秘书》八十册、宣统二年《龙池山幻有禅师语录》三册、雍正9年《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九册、光绪11年《癖谈》一册、万历35年《新编纵横齐目三台通书》十六册、同治11年《善女人传》一册、光绪23年《石鼓文五种》五册、同治10年《数学精详》五册、道光6年《澹静斋说课》一册、同治10年《释氏十三经》八册、道光7年《四书图考》存一册、嘉庆5年《蟬史》六册、道光3年《增补万宝全书》一册、道光15年《吾学录》一册、光绪年间《吴诗集览》廿册；又和刻本有：宽正5年《刘向说苑纂注》十册、天明5年《毛诗品物图考》五册、文政10年《社盟算谱》二册、文化5年《神器谱》五册、明治年间《算法古今通览再补》五册、元禄16年《授时历图解》一册、明和6年《拾机算法》五册、明治13年《天道溯源》一册、天保8年《缩临古本论语集解》二册、元禄13年《田禄图经》二册、文化11年《五明算法前集》二册。二、“民国后”有：1912年《说文撷华》六册、民国《硕果社》存二册、1916年《适园藏书志》六册、1960年《台北县志》存一册、民国《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册、民国《首楞严经疏》八册。三、“鉴古堂藏书”有：同治12年《三山同声集》二册、道光18年《子史精华》卅三册、光绪29年《陶园全集》二册、同治6《汀州府志》十八册、光绪6年《重修鹿洲集》十二册、道光25年《咸陟堂文集》十二册。

之“民国前”标准衡量，则其古籍总数为402种3224册。³当然这个总数还未计上一部光绪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一千余册。

这一批海外古籍不论从数量或者质量都算不上可观，然而追溯其入藏缘起则绝对是非同小可；当年甚至多番誉为海外“首屈一指”。比如1956年到马来西亚大学进行短期讲学的钱穆（1956）就颇感震惊，其云：

我此次应马来西亚大学之邀请，在其中文学系，作短期之讲学，最使我感到满意者，厥为其中文图书馆之设备，以现有藏书言，实在东南亚可以首屈一指。在此非常时期，书籍访购不易，而马大中文图书馆能在匆匆几年内，居然有达十三万册之数量，而且就大体言，所有藏书均经选择，确为中文图书中之有永久价值之书籍。

因此围绕着这批古籍最值得探讨的莫过于当初1953年之入藏盛况，及其1962年部分转移至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后之初期光景，顺此以往乃愈见其当下之冷落；尤其虽然仅隔数十年，今日这批古籍之入藏与聚散竟连馆内人也不甚了了，社会上更连其存在亦知之绝少。实则如今也仅有书叶间藏家私章所示之古籍来历，当中多有清末民初闻人与学者，据此多少仍得略窥当年风光。

关于马大图书馆藏的这批古籍，至今关注度极低，且目前保存情况也不甚乐观⁴。台湾国家图书馆于2015年曾与马大合作，将这批古籍目录编入其网络版《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只是其中仅著录283部古籍⁵。此外，宋燕鹏于2013-2015年之间写过数篇文章讨论这批古籍中的佛教典籍与融熙法师，以及“鉴古堂藏书”和“何克柔藏书”；其文中曾慨云：“如今懂古文繁体字的本地华人越来越少，甚至马大图书馆职员中连华人都寥若晨星，必然造成这大批古籍的重视程度日渐降低。这个状况可能是当初捐赠者所没有想到的。”（宋燕鹏，2013a）这确实是当下这批古籍的忧患；更其思及当年曾坐拥这批古籍的马大图书馆竟是“在东南亚地区来说，固然是首屈一指，最具规模的一间图书馆，就和海外著名的中文藏书比较，也已经坐上第七把交椅了”（李若莲，1956），现如今这番态势实在情何以堪。

本文所探讨即自1953年马来西亚大学这批古籍入藏之缘起与始末，以至1962年新加坡大学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大学分家后之部分转移吉隆坡，及其往后之发展乃至当下现状。这当中偶然的人事与时局碰撞乃促成其古籍珍藏的特殊成因，然而扬尘终归落定，强大的社会恒常力量总会教一切就范，于是马大中文系自身立足点之所限决定了创系古籍入藏之盛举终是昙花一现；且历史之吊诡更在于相同境况在1962年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大学创设中文系时近乎依样循环上演一遍，只是规模缩小了好几倍。无论如

³ 我在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约一年期间任职于马大中文系，其时得入东亚图书馆翻阅古籍，并于2016年4月至9月主动协助馆员整理目录。可惜事未竟而2017年初该馆员离职，随后我也紧接着离职。2018年4月东亚馆才又入职一位专职中文馆员，据悉2017年3月份我离职后，其古籍目录整理的工作再无后续跟进。

⁴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保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的中文古籍，近期经与北京中华书局合作编辑出版其古籍目录，并列入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计划。

⁵ 查阅台湾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联合目录》，网址：<http://rbook2.ncl.edu.tw/Search/Participate/2>。

何，今日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这一批古籍之零落，绝不表示前人之卓识与心血亦将随其隐没；反而当下之时艰更彰显其初始草创聚书人的孤清与傲岸。如今，除了埋首史料以重塑其逾半世纪的典藏与聚散历程，就唯有借其书页间偶现之藏书章分析，方得一窥当初入藏之规模与盛况。

二、1953年马大中文古籍入藏之缘起

马来亚大学乃1949年由当时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设立于新加坡，至1959年则正式成立新加坡与吉隆坡两个分校，而1962年更各自独立成为“马来亚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坐落于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分校乃至今延续“马来亚大学”之名。

1953-1954年马来亚大学两度拨出巨款购置中文书籍乃至开设中文图书馆的直接原因就是1953年创设的马大中文系，就如中文系创系主任兼购书经办人贺光中所云：“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开设中文书籍部就是中文系创办的直接产物。”⁶（Ho, 1954）

马来亚大学自1953年成立中文系，正式开课以前就“拨予中文系购书开销为廿万元”购置8万余册中文书籍（南洋商报，1953f），其中绝大经费用于购置古籍（南洋商报，1953i）。当年乃由系主任贺光中“代表马大赴香港及日本蒐集该系及其图书馆所需中文课本及参考书，历时一个月”（南洋商报，1953f）。然而不可思议的是，1953年中文系第一届报读学生“新生只有一人”（南洋商报，1953h），乃至于此批巨资收购的中文书籍被社会嘲讽为“空留着养蠹虫”（金榜居士，1953）；而更添稀奇的则是即使“门庭冷落”，1954年10月份马来亚大学仍再委托贺光中添购4万余册主要为古籍的中文书，包含1千余册元明版古籍。至此其图书馆馆藏之13万册中文书籍，贺光中自诩为：“不仅是东南亚最好，甚至是中国以外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仅次于美国的三家大型图书馆、日本的二家与台湾的一家。”⁷（Ho, 1954）乃至其亲自“悉力指导，编成目录三大本”（南洋商报，1957a），可见贺光中极为重视这批购置的藏书。

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管理的马来亚大学何以如此不合常规地大手笔购置这批中文古籍，并无明确说法。但综合分析当时的各方信息，大略能窥知其中某些诱因，主要为二端：一则时局因素，即当时华人社会之大环境；一则人事因素，尤其贺光中之个人志向与旨趣。

（一）时局因素

首先马来亚大学当初设立中文系与华社大众期望之间是有差距的，甚至是“以慰情聊胜于无的心情去欢迎他”；正如1953年一篇社论很具代表性，其云：“马来亚大学，要开设中文系，延了一年又一年，使我们华人有如‘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到得华人自己筹划创办大学时，他才宣布马大的中文系，可于今年十月间成立，而教授的问题，尚付阙如。”而其中提到“教授的问题”乃最受诟病者，即临开学前数月所

⁶ 原文为：‘The need for a Chinese section of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⁷ 原文为：‘A collection of this size and quality is already not only the best one in Southeast Asia but also the best in the world outside China except for three major collections in America, two in Japan and one in Formosa.’

聘得讲师仅仅“可能共有三个人”，直云：“像这样的阵容，就认足以为马来亚超半数人口，负起发扬固有文化的责任，不管说得怎样动听，我们华人是没法加以相信的。”（康如也，1953）⁸

又其云“延了一年又一年”，则至晚于1950年4月就已举行“马来亚大学中文学系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出席者有该校副校长艾伦博士及委员魏坚士、李之华、李绍冒、许云樵、杜美教授，及新委员中华总商会代表连赢洲、马来亚商联会代表梁长龄、及马来联邦华民政务司等三人”（南洋商报，1950）。此后年年重申此议，且年年都煞有其事却年年落空，比如1951年报道云：“由于中国文学系之开设，马大图书馆中将设立一中文部图书馆，当局且已派人赴香港蒐集中文书籍，檳城万兴利银行主人叶祖意已捐献二十五万元，为创设中文图书馆之用。”（南洋商报，1951）结果不仅中文系未办，即使中文书籍也未见入藏。

如此到1953年初，华人社会已是万般按捺不住，包括不满于马大仅接受英校文凭的收生标准；于是纷纷著文评论，如谓：“马来亚大学早就决定设立中文系与巫文系。经过两年的筹备，巫文系似乎已经有了头绪，在最近期间内就可开办。可是中文系，因为社会对它的期望过殷，同时因为申请者太多，弄得该校当局反而手忙脚乱，迟迟不能产生。我们知道该校中文系负有重大的使命，所以一再著文评论。”（南洋商报，1953b）

实则自1953年开年以来华人自己筹办大学已是群情高涨，报章连日刊载社论，如〈论马华大学须提前创办〉开篇云：“旬日来全马华侨对于未来的马华大学寄予热烈的期望”（南洋商报，1953a），又〈响应创办马华大学〉云：“连日来，各华文报章上都以重要的版位刊载着关于陈六使先生发动创办马华大学的消息，接着响应纷纷，这真叫人兴奋。”（飞力，1953）

就在这样的呼声高亢中，马来亚大学突然宣布中文系当年开课，实则连教员、图书、课程都全未见踪影；因此难免遭人议论为是抢先在华人筹办大学之前匆匆宣布设立的中文系；且更有直接道破者云：“所以有人怀疑马大之匆忙设立中文系是欲‘先发制人’的和南洋大学‘抢生意’的？”（林逸，1953）另又云：“如今，南洋大学已获得政府批准，马来亚大学副校长才宣布在今年十月间中文系可能开设，并从澳洲聘得一位姓贺的中文系讲师，不知马大副校长之用意何在？”（振炎，1953）

1953年正是“发动筹办南大到了最高潮的一年”（王如明主编，2015：89），而如此形势下，马来亚大学必然有所触动；其顾虑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华商的资金支持。就单以1953年开幕的“百余万元建筑之新冷气图书馆”为例，校方专请陈六使主持开幕，马大校长“麦唐纳赞扬陈氏对该馆贡献最大”（南洋商报，1953f），同时极尽亲近赞誉之词，云：“吾人之朋友陈六使氏，实为本坡一伟大之公民，……氏之捐助马大巨款，将使马大师生永受其赐，同时亦使本坡人士钦仰不已。”此外捐助马大图书馆的另有李光前50万元与叶祖意25万元（星洲日报，1953）。当然还不得不注意的是，当日二大中文报对此新馆开幕的报道，不约而同都强调了中文图书的缺失，如

⁸ “康如也”实际上就是林连玉的笔名，1953年的这篇社论同时又见其《杂锦集》中。林连玉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精神代表，1980年以后更被奉为“族魂”，其文中所表达的意见很具代表性影响力。

《星洲日报》云“新图书馆中尚未见有中文书籍”、《南洋商报》则云“书籍以英文居多，中文书籍甚少”。

于是康如也（1953）直击要害地代华社立言，宣称：“过去马来亚大学，我们已经赞助不少了，这可以证明不是自私自利，单为自己的文化而设想的，今后我们仍当为马来亚大学尽其所能及的力量，以予赞助。”这也正是当年马来亚大学所期盼的。

至于其致力经营中文图书馆，则可作几方面的诠释。首先上文述及中文系开学第一届讲师三人、学生一人，乃至1954年10月仍是“听讲生只有九名”（南洋商报，1954b）；于是资源设备上的添置似成一弥补途径。其次更重要的是，当时华人社会普遍对中文图书资源的渴求，乃至对图书馆的呼吁。其中最可注意的包括上文提到1951年叶祖宪捐献25万元创设马大中文图书馆，当时著名学者王仲厚（1951）立即发表一篇〈贡献于马大中国图书馆者〉，文章尽露雀跃之态，云：“马大之创办中国文学系，固具同一卓识，而其增设‘中国图书馆’更有远大眼光，盖此举之在今日，洵属刻不容缓之图，越再稽迟，则坠绪茫茫，虽欲寻而不可得矣。”嗣后更于1953年终于确定开办中文系后又连着一周发表四篇〈漫谈中国图书〉，接续两年前为中文书籍进行学术源流导引，且含推荐于马大中文图书馆之意。（王仲厚，1953）

实则往更大范围审视，即使撇开马大的中文图书馆不论，王仲厚所谓“刻不容缓之图”确实是当年华社实况。尤其到1952年几乎已形成共识，当年马俊武（1952）即已将“设立华侨图书馆”作为“南洋教育文化的展望”的重点，云：“凡初到此地的人，发觉华侨本身没有图书馆，他会惊奇的，就凭华侨富商巨贾的力量，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产生一所图书馆，总而言之当地华侨总商会诸君子，实应领导社会，发起组织华侨图书馆筹建委员会，进行筹募，必可顺利完成。”

从那时开始华人社会各地自主筹办图书馆，于是1953年更在马来半岛组织起“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进会”，并于1954年2月开始在各地开展“图书馆运动”；到了1955年就“已有五十四间图书馆，图书一万册，会员一万人”的佳绩，当年的会员大会上林连玉致辞云：“图书馆之重要性，对于提高民族国家之智识水准，实不下于学校。”（南洋商报，1955c）反观同期新加坡则华人民办图书馆并未成风气，乃至时人疾呼“百万华人无一图书馆”（书生，1956），且引起连番回响，包括更沉痛的称“百万华人岂止无一图书馆”（蜀人，1956），当然也有较积极的指出“百万华人何不创立一图书馆”，其云：“事实上单办教育、立学校，是不能统收功效的。所以创立‘公共华文图书馆’这一事是成为刻不容缓的要务，纵然只是首创一间，也是宝贵的，岂能缺少。”（庄康，1956）

无论如何，这都显示当时新马两地华人对于中文图书馆的渴求。而此时马大前后耗资25万元购置的中文书籍，也迎来社会呼吁开放给公众的声音，且促使马大图书馆主任1954年宣布“将由校务会议之图书馆委员会考虑”是否开放（南洋商报，1954c）。但显然要求未获批准，乃至1956年华社仍在“建议马大中文图书馆开放”（李若莲，1956），再1957年亦持续呼吁“马大中文图书馆应开放”（南洋商报，1957b）。

更何況在这种形势下，南洋大学开办且着意重视其图书馆的创设，尤其在社会概念中南大中文书籍，“大批古籍，数量之多，不亚马大”（南洋商报，1957b）。而事

实也是南大筹办之初就请来当时中文图书馆界的权威严文郁出任馆长，严氏曾掌管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大图书馆等国家级与一流高校图书馆。蓝文钦《严文郁先生年谱简编》称其1954年充任南大图书馆馆长，乃应时任南大校长林语堂之邀请，即“向联合国请假1年，于除夕飞抵新加坡”（转引自郭明芳，2017）；而其“由美来星途中，经东京、京都、香港、澳门等地，具曾与若干书籍收藏家接触，并观察各方情形，以备购书之参考，在港时曾看过一收藏家所有之十万八千余册，价五十万元之中国书籍，相当感到满意，惟价格尚未正式讨论。”（星洲日报，1954）可见工作开展非常积极。

而事实确是1955年“南大图书馆已加紧建筑中，该校已拟就三年购书计划，预定费用一百万美金”，并且宣称：“南大已向澳门藏书家姚钧石氏购入十余万部之我国古今书籍，其价值为港币五十万元，姚氏为表爱护南大至意，决捐献南大港币十万元。”（星洲日报，1955）同时《南洋商报》则称：“最近经决定向澳门华侨藏书家姚钧石氏购买中国古书十余万部，其中多为线装书。”（南洋商报，1955a）

澳门姚钧石是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其室名“蒲坂书楼”，姚氏所藏古籍多源自近代广东著名藏书家徐信符“南洲书楼”遗物。当年报章对于南大购买这批书做了较细的报道：

姚氏所藏书籍为其先人四代遗物，前此美国有人出价美金廿万，但彼不出让，盖渠仅欲让诸中国人之公众图书或学校，以冀永远保存中国人之手。姚氏对吾侨创办南大则极表兴奋，严文郁氏于来星经港时曾顺道往澳门观阅全部藏书，认为相当满意。据悉，姚氏并希望南大派员往澳门验收，并决将八十个书橱全部报效南大。至全部书籍之装箱员工及木箱价值运费保险等费，概由南大支给。（星洲日报，1955）

然而这次购书方案最终未得落实，如郭明芳（2017）也指出：“严氏居中售书南洋大学一事应未成而暂作罢。”首先，1959年南大图书馆统计全馆中西文图书也仅“九万五千本书”，而“其中六万三千本是属于中文书”（南洋商报，1959b）；若说确实购入姚氏“十余万部之我国古今书籍”，则后来统计数量不相符。其次，目前所知姚氏藏书落户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并成为其亚洲研究中心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而据其馆藏记录：“此批藏书共计3105种，其中元版1种，明版179种，清初（1644-1795）版本628种，清稿本121种，其它版本2176种。如论册数，约计45000册。”（沈迦，2009）再次，根据当年代表UBC大学向姚氏收购藏书的何炳棣教授回忆：“1958年春天，我还在纽约，北京大学的严文郁先生寄来目录。于是我将他转给了UBC大学。近五万册书，都是古籍，这样的机会不会多。”（转引自沈迦，2009）同时何炳棣当年5月份一封信函更提及严文郁寄交5册《蒲坂书楼藏书目录》，且“近得严氏函，索价65000美元”（郭明芳，2017）。又次，1954年12月底严文郁出任南大图书馆馆长，为其筹划藏书，但1956年正式开学时的图书馆主任为王咏祥（星洲日报，1956），而后1959年则为熊叔

隆（南洋商报，1959b）；又据蓝文钦《严文郁先生年谱简编》提到1955年林语堂与南洋大学董事部“发生歧见”，“双方僵持月余，全体教职员总辞”，于是同年“5月初，先生返美复职。”（转引自郭明芳，2017）因此期间应无空隙落实购书计划，乃至错失一份珍贵典藏，殊为可惜。

无论如何，南大图书馆确实在当时给马大图书馆征购书籍形成竞争压力，比如1957年伍连德的一批保价一万元的1200册藏书就捐给了南洋大学（The Straits Times, 1957b）。因此上述1953年前后之整体华人社会文化背景，尤其加上南大图书馆聘用严文郁购置中文书籍并于日本及港澳地区积极访书，这一切难免会给也曾任职图书馆并了解古籍收藏价值的贺光中之购书活动带来影响。

（二）人事因素

1953年马大中文系正式聘用贺光中为高级讲师兼代主任，马大副校长薛尼凯恩爵士介绍称：

贺光中博士现任职于澳洲坎贝拉国立大学设立之国立图书馆，彼来马大任教之原因，为彼本人甚希望能与华人社会发生更密切之连系。贺博士为闻名于英国及澳洲之学者，现年四十岁，出生于北平，肄业于上海及布鲁塞尔，曾任上海亚洲学院教授、南京东方学院教授（一九四七-四八）、南京金陵大学教授（一九四八-四九）、香港大学中文系中国语文及文学之高级讲师（一九五〇-五二），后因私事离开香港大学往澳洲任现职。

（南洋商报，1953c）

这位贺光中在当时华社“心目中，似乎很是陌生。若论名气，还在当地所有的，如庄泽宣、何永佶、周辨明、熊叔隆、黄遵生诸博士之下”（康如也，1953）。然而这只是新马华人不熟悉当时学术界的主观印象。贺氏在香港大学是马鉴接任许地山中文系主任期间唯一获得校方全职聘用的教授，因此马鉴1950年退休后曾一年左右暂任系主任。此前他原是南京金陵大学教授，转往香港跟马鉴情境相类似，据时人陈君葆日记云：“他现在已经成了流亡学者，都要暂时留在香港找生活，由西门（西门华德教授）介绍他当了大学方言班的教习，大概教普通话之类。他是研究佛学的，那一套现在恐不能退藏于密了。”（转引自许振兴，2005）正是贺氏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经验，论者乃称：“马来亚大学首任中文系主任贺光中吸纳香港大学自1933年以来的文史哲贯通的华文教学方法应用于新加坡当地，无论在教学架构、学术活动甚至是图书馆材料，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不同方面均有着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影子。”（罗乐然，2018）

此外，贺光中父亲在北大教书时与胡适相熟，其本人也与胡适有往来，胡适曾向人介绍云：“贺光中是贺志才的儿子，贺志才是北大的同事，教法文的，他娶的是法国太太，所以贺光中像个外国人；但他是读中国文学的，念得还不错。”（胡颂平，2015：133）

胡适称贺氏“读中国文学的”，其著有《论清词》一书为1958年出版⁹，此外1956年出席巴黎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汉学会议”，发表《唐宋民间音乐研究的新途径》。这场会议是当时少有中国大陆学者出席的学术会议，却留下了周一良与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等人因历史分期涉及意识形态上的一段过节，周一良（1998）晚年不无悔意地追述当年“做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云：“几十年之后，除罗香林教授早已逝世外，我与上述诸学人都有机会重晤，或重温旧谊，或切磋学术，同时不免深有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其事发就源于贺光中主持并翻译罗香林的报告，据当年翦伯赞的汇报云：“香港大学罗香林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的报告，由马来亚大学讲师贺光中翻译。周先生提问，认为罗香林所说的历史分期实际是胡适的观点，而历史分期的标准应该主要看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土地所有制形态。贺光中请主席制止周先生发言，翦老见状当即指出：想要限制中国代表发言则是对新中国不友好，向大会提出抗议，最后会议组织者白乐日和会议主持人史华慈都支持允许周先生继续发言。”（转引自陈怀宇，2015）

前述贺氏“研究佛学”，实则这才是其主要研究志趣。查阅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曾于1972年“购入贺光中藏佛经一批，其中佳本颇多”（卢伟，2011）。此即目前馆内之“贺蒋佛经善本库”，其介绍云：

这批“贺蒋佛经善本库”包含公元8世纪至18世纪的110部中国、日本、韩国的佛经，其中有些残缺有些齐全，形制上则包括卷轴、经折，以及手抄或雕版印刷。这批1972年由图书馆购入的特藏佛经，乃贺光中教授及其夫人蒋振玉的收藏。这批佛经包含日本春日版、中国宋元版本，以及目前雕版仍保存于韩国海印寺的高丽大藏经早期印本，是历史语言学、版本目录学与佛学研究学者的珍贵资源。¹⁰（Berkeley Library，2019）

贺光中夫妇的这一批赠书提升了该图书馆中文古籍收藏地位，其馆长周欣平（2012）评断云：“总体说来，三井文库、贺蒋文库和密韵楼旧藏的入库是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善本最重要的来源。”实则当初贺光中代马大购置的中文书籍中，佛学书籍确实也是一大特点，当年报道就称：“那些有志于佛学研究学者，这个图书馆的收藏是一个资料的宝库。单就这个领域本身就有二万册书籍。”¹¹（The Straits Times，

⁹ 胡文辉（2012：145-162）引赵尊岳女儿之言称：“先父在星加坡大学任教时著有《论清词》一集，由另一教授持去付印，但出版后著者赫然为该教授之名。”因此以为贺光中此书有剽窃嫌疑，云：“疑赵氏以抗战时曾任伪职，五十年代寓港时境况当不佳，能到新加坡大学任教恐非易事；而贺氏为新大中文系主事，对于赵的去留自有决定性的作用，赵寄人篱下，故以《论清词》一书投桃报李乎？”

¹⁰ 原文为：‘The Ho-Chiang Collection comprises 110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sutras, in part or in whole, in scroll or accordion-fold format, manuscript or block-printed, and dating from the 8th through the 18th centuries. Acquired by the Library in 1972, the collection was assembled by Prof. Ho Kuang-chung and his wife, Chiang Chen-yu. A rare resource for historical linguists, historical bibliographers, and scholars of Buddhism, the collection includes Kasuga-ban, Sung and Yuan editions, and an early printing from the Tripitaka Koreana woodblocks now housed at Haeinsa, South Korea.’

¹¹ 原文为：‘To those interested in Buddhism, the collections in the library are a treasure of information. On this subject alone there are 20,000 volumes.’

1957a) 此外1971年时任中文图书馆主任林鸿图(1971)著文介绍馆藏图书,专列一节“佛学典籍应有尽有”,云:“除上述藏经外,中文图书馆还藏有佛学类书、字典、辞书数十种,佛学竺书约十种,更有以研究佛学为宗旨之定期刊物数种。其中以京都美术社于一九二五年间刊行的《佛教美术》二十册为最罕见的珍本。”

同时,贺氏上述关于唐宋俗乐的研究也应该是佛教历史研究的拓展,他在这方面也收集了许多珍贵资料,据1961年台湾《联合报》报道:“我国在南洋大学执教的著名学者贺光中先生,他所收藏的唐宋乐曲,非常之多,爱好并向往我先圣先贤古乐的朋友们,应当以最大力量,协助贺先生早日完成他的出版的工作。”(转引自陈冠如,2009:382)

由此可见贺光中本人就比较着意收藏中文古籍文献,于是加上马大设立中文系在当时所遇到的客观环境,便成就了贺光中手握丰富资源而大展拳脚,包括根据其研究兴趣购置图书,当然也更因此成就了马来亚大学当年颇以自豪的中文古籍收藏。这与其初期中文系师生人数之凋零形成强烈对比,于是1954年贺光中自述中进行了多番反复的申明与辩解,云:“一个人展开某学科领域学习的第一步就必须是熟悉其文献与版本目录。这在中文系学科更是如此。”又称:“如果文献与版本目录是中文系学科的起步,那么古代典籍就是其核心。不以古代经典为其绝对主体出发的,根本不能称其为严肃的中华文化研究。”¹²(Ho, 1954)

当然上文述及马大中文系既是形势逼使其匆忙“先发制人”,中文图书馆更不可能进行如此长远细密的规划。因此贺氏初始任务乃购办中文系“所需中文课本及参考书”(南洋商报,1953e),而其大手笔入藏珍本古籍应该并非马大最初本意。于是其个人旨趣与志向即成了关键因素,包括创设一座世界顶尖中文古籍典藏以为其终生成就。当然,在此基础上也不排除严文郁代表南洋大学访购港澳等地珍藏古籍之竞争影响;即贺氏解释其入藏大批古籍原因时所述之“由于中国政治变化造成的中文书籍购置愈加困难”,以及“香港古籍资源急速减少”¹³(Ho, 1954)。

据此推论,唯有理解当初这段古籍入藏缘起及其背景,方能多少明白马来亚大学自1950年代初形成如此骄人的古籍收藏,但却并未持续经营,乃至自此更无收购古籍的举动;白费了贺氏当年的精心经营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初贺氏自夸为海外名列第七的古籍珍藏,颇有以此为其毕生成就之势,同时中文图书馆最初十余年的管理即由贺氏妻子蒋振玉主持(林徐典,1967),其最初馆藏目录亦由夫妻二人合编;如此夫妻倾注全力创建经营,然而至晚年竟未将自身最珍贵的典藏捐赠给这个图书馆,包括其佛经珍藏与唐宋乐曲史料文献,其中原由亦可据此推知。

¹² 原文为: ‘The first thing a person who undertakes the study of a subject must do is to acquaint himself with its bibliography.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Chinese studies.’与‘If bibliography i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lassics are its core. No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called serious if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is not given a predominant part.’

¹³ 原文为: ‘With the recent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purchase Chinese books.’以及‘the Hong Kong reserve was diminishing rapidly’。

三、最初马大中文古籍收藏概述

马来西亚大学图书馆购置中文书籍，早在1950年“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就已筹备，报道云：“其后，又讨论图书馆之建设，主席报告，现虽有叶祖意氏所捐之十五万元，但如何购置图书，以适合大学中文系之用，大多数委员主张会组一小组委员会处理之。关于中国国内大学图书馆之参考资料，由许云樵代为设法，以资借镜云。”（南洋商报，1950）可见叶祖意这时就已捐献15万元作为购置中文书籍的经费，嗣后下一年再增至25万。而1951年还有报道称“马大图书馆中将设立一中文部图书馆，当局且已派人赴香港蒐集中文书籍”（南洋商报，1951）；然而就如中文系迟迟未开设一样，这些购书计划似乎也未见后续发展。当然也是机遇凑合，也亏得当初未动用这笔巨款，才成就了贺光中1953-1954年两次大手笔入藏中文古籍。

贺光中这两次大批收购入藏的十三万册中文书籍，可以较肯定大部分为线装书，古籍更是不少；即1971年林鸿图（1971）介绍当时新加坡大学中文藏书，仍称其时接近十四万册的中文书籍，“其中约半数是线装书，可见所藏中国古籍的丰富”。

1953年，贺光中从新加坡出发往日本、香港、台湾等处访书，其时间应是8月中旬，并预定9月18日返新；据当时代理校长石久铎教授介绍其行程云，“最近抵星就任该校华文系高级讲师兼代理主任之贺光中博士，经于日前赴香港及日本，物色该华文系所需读物及参考书。在彼赴日途中，彼或将顺路赴台湾寻购所需书本。贺博士预料可于下月十八日返星”，又称“贺博士因在澳洲曾任大学图书管理员之职，彼对该校所需书本当有把握。彼将物色之书本包括国学、古文，以及历史材料等”。（南洋商报，1953e）

这次访书，“贺光中博士费时六周，购得中文典籍文献等共计达八万册，费用达十五万元，其中有若干明版书与手抄珍本”，实则购书总额应是“共叻币十八万五千元”，并于当年10月16日就已公开其大致购书目录，尤其当中的古籍珍本。11月6日，贺氏从香港购得的书籍的“首批三十六箱业已运到”，且“预算在此后十天中，尚有一百五十九箱自日本运到。过后，更有甚多将自香港运来”。（南洋商报，1953j）

马来西亚大学这第一批购置的中文书籍最初略分为六类，即：传记、百科全书、图书索引、经类、史地类、集类、丛书、杂志、珍本。其中尤突出丛书与珍本二类，其云：（南洋商报，1953i）

下列之原刊丛书：《古香斋丛书》《藕香零拾》《知不足斋丛书》《经韵楼丛书》《守山阁丛书》《岱南阁丛书》《适园丛书》《汉魏丛书》《雅雨堂丛书》《天壤阁丛书》《颜李丛书》《广东丛书》《铁华馆丛书》《湖北丛书》《湖北先正遗书》《正谊堂全书》《美术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平津馆丛书》《士礼居丛书》《崇文丛书》《汉学堂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彊村丛书》《津逮秘书》《小方壶斋舆地丛书》《文渊楼丛书》及其他。

另外还有：

珍本：元明版本及明代手抄本（内中若干尚未见诸刊行），计一百余卷，
 尤足珍贵者，计有明刊《文苑英华》《七经逢源》（手抄本，未刊行）、
 《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里强调“原刊丛书”，可见不是民国后的翻印本。而其所列，除了《适园丛书》、《颜李丛书》《广东丛书》《湖北先正遗书》《美术丛书》《彊村丛书》《文渊楼丛书》，以及日本出版《崇文丛书》，其余多属于清代刻本。其中较值得注意的如《津逮秘书》，原刊为明代崇祯年间的毛晋汲古阁刻本。据清代中期以降之郑德懋、叶德辉等记述，当时《津逮秘书》之书版已不存，唯有零星书种的书版散落各处；而今人研究也指出清初“《津逮秘书》书版首为金陵蕴古堂所得，……此时应是《津逮秘书》最后一次印刷了。其后，丛书书版分散入各肆”，同时根据郑德懋时代推测“《津逮秘书》书版或亡于乾隆时”（郭明芳，2018）。因此当初马来亚大学所藏“原刊丛书”之《津逮秘书》，应是极有价值的古籍，只可惜目前马来亚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目录中均不见本书踪影。¹⁴另外则是《汉魏丛书》，原书应为明万历刻本；此后清代多有增修本，如乾隆56年《增订汉魏丛书》。目前新国大图书馆目录所示，1950年代以前《汉魏丛书》版本有1925年涵芬楼印本，以及乾隆56年《增订汉魏丛书》，此外还有一部“出版年不详”之86册线装《汉魏丛书》。

其余有些信息则较明朗，例如《正谊堂全书》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虽原书为康熙印本，但道光之间均有翻印，目前新国大图书馆目录所示即分别为同治7年与同治13年的后印本。另外还有“珍本”中所列之《文苑英华》，本书自南宋周必大刻本以降，至于明代中期以后才有刻本；近年新发现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均藏有隆庆元年初刻再经万历年间三次递修本《文苑英华》。而据新国大图书馆目录所示，其明版《文苑英华》一百一册，出版年份记为1567年，即隆庆元年；可惜未见版式信息，只是其中记录册数与上述中国高校图书馆所藏一致。最后是“珍本”中的明代手抄本《七经逢源》，本书题未见于各地中文古籍书目，包括当下马大与新国大图书馆目录；尤其当初又未提供作者内容等信息。本书虽属抄本，但以贺光中亲自鉴定应具一定学术性，非等闲誊录杂抄之类，因此若当初报道书名无误，则当有探讨价值。

1953年11月30日，应是采购书籍基本均已运抵，贺光中于“克兰尼律公开演讲，题为‘马大图书馆中文藏书’”（南洋商报，1953k）。自其8月份出发访书以来，校方多番向社会高调宣传其巨额购置中文书籍，尤其夸耀书籍的数量与质量；至此乃达至一个高潮。这连番举措实则不无宣扬其开设中文系诚意之用心。而事实确实也证明其宣传功效颇佳，就在1954年马大购置了十余万册中文书籍，便有人开始为新任南大校长林语堂担忧，云：“确实，林语堂博士是给了这些学生进入南洋大学后的许多美好承诺，但林博士若要赶上贺博士所已经购置的[那一批中文书籍]，仍还须要一段时

¹⁴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目录主要依据其网上检索系统，网址：<https://linc.nus.edu.sg/search~S16/>。

间。即使林博士真能另外建设起一座著名的中文图书馆，贺博士的这一批书籍对于高中毕业生而言仍还是会保留其莫大价值。”¹⁵（Cheong, 1954）

1954年的第二次购置中文书籍，据贺光中自述是“今年10月份我再度到香港，另外添购4万册。这一来图书馆的中文书籍总数就达到13万册”¹⁶（Ho, 1954）。本次购书一共花费7万元，加上1953年的18万5千，则其总数正好25万5千，即当初叶祖意捐献中文图书馆购书的数额。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这一次购书竟招致不小的争议。首先是11月13日，在他结束赴港访书之行回到新加坡后，英文《海峡时报》刊载一篇报道，其中包含贺氏访谈记录，其标题为“偷运出中国的战利品”，开篇即云：“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贺光中博士刚从成功对抗共产党官僚的又一次胜利后归来。他的战利品：四万部珍贵书籍。为了运出其中大部分书籍，他得运用一个间谍头子般的机智指挥其特务人员；而他本人则在香港幕后操作。”¹⁷（The Straits Times, 1954）这篇报道中甚至引述了贺氏对其“偷运”手法及过程的讲话。

而隔天的14日，美国合众社也刊登一则“发自新加坡的电讯”，其云：

穿过了竹幕，成功地偷运到香港的四万册名贵的中文书籍，如今已陈列在马来亚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了。指挥那从中国运出这些书籍的复杂而有效率的机构的人，是该大学中文系主任贺光中博士。贺博士最近刚从香港回来，为着要运出这批图书中的许多书籍，他不得不运用着一个间谍首脑般的机智，调度他的“特务人员”，而终于成功地克服了许多共产党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北京的文教局。贺博士之成功，是得力于共产中国行政机构中的若干部门的矛盾。他说：如果他的书籍在天津受到留难，他就叫他的工作人员试在上海申请；假如在上海也受到留难，他就转移他的书籍到别的口岸。他说：用着这种方法，他的书籍便经常的得运出来了。

（转引自李微尘1954）

关于其“偷运”手法，13日之英文报还另报道：“贺博士透露他还有另外渠道的供应。当时有许多航运人员都会偷运东西，比如共产党报章内藏匿珍贵图书。”¹⁸（The Straits Times, 1954）

¹⁵ 原文为：‘True, Dr Lin Yutang has promised these students wonderful things in Nanyang University, but Dr Lin may still take some time to acquire what Dr Ho has already got. Even if Dr Lin does build up another famous libra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Dr Ho’s books will still be of great value to Chinese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¹⁶ 原文为：‘I returned to Hong Kong in October this year and secured another 40,000 volumes. This brings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books for the library to 130,000.’

¹⁷ 原文标题为：‘Booty smuggled out of China’，开篇为：‘Dr K C Ho, head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s Chinese Department, has just returned from another successful tilt at Communist bureaucracy. His prize: 40,000 valuable books. To get many of them out of China, he had to manoeuvre his agents with the wile of a master spy, while he remained in the background in Hong Kong.’

¹⁸ 原文为：‘Dr Ho revealed that he had another source of supply. There were many sailors who were not above smuggling out valuable collections hidden between copies of Communist newspapers.’

这连番报道相信给贺光中带来一些麻烦，尤其英文报道中强烈表现出揶揄中国共产官僚体制的论调。于是贺氏立即于11月16日在英文《海峡时报》刊登一篇长文通盘解释其前后购书行为，其标题为“大学中文图书馆将成为世界顶尖之一”；开篇仅短篇幅辩解，称其香港之行纯是履行一个大学学术人员的职务，并无任何政治含义，且称：“我是向声誉卓著的家庭与书商购置这些书籍的。当然或许后者曾经历你所描写的那些从中国运出书籍的困难，但无论如何绝不至于以此谴责或表扬我或者是大学。”¹⁹ (Ho, 1954)

实则这篇自述的绝大篇幅是说明其购置这些中文古籍以及建设中文系的整体设想，即其云：“既然你们选择如此戏剧化我的纯学术行程，那我现在应得许可让你们的读者了解一些目前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所购置书籍的优秀质量，以及我采购这些书籍的更为严肃的用意。”²⁰ (Ho, 1954) 下文则主要解释其专门购置大量古籍的原因，尤其是文献及版本目录学对于严肃学科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性；再则乃介绍其购置书籍的数量与质量，并夸耀为名列海外第七的中文古籍典藏。

当然英文报道既直接引述贺氏访谈原文，而其自述又未否认其谈话，包括并未完全否认“偷运” (smuggled) 之事实；无怪乎仍还是有人继续提出质疑，尤其关于所谓“偷运”书籍之内容性质。11月25日一篇言论称其依据一些业内人士信息，直接指出：

据他们所透露，大陆上的线装书，是有公开的定价的；除了一些所谓“海内孤本”和特殊的版本不许出口外，其余都可以依照一定的手续，结汇外运。……我深信贺光中博士所成功地偷运 (smuggled) 出来的，一定是这类珍贵的古籍！（李微尘，1954）

此事当然再无后续发展，只是目前马大与新国大所有中文古籍加起来也仍未见有这一类珍本乃至“海内孤本”。²¹其实，根据后来接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马蒙记录其父亲马鉴藏书的《记老学斋藏书》所称：“[1954年]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创设中文系，亟切求购中文图书，友人有以出让藏书为请者，因检出重复及不常需用者八千余册，以应所请。”（转引自李国庆，2018）可见这一年在香港收购的4万余册图书中就有8千余册源自马鉴旧藏，且多为“重复及不常需用”者，其实当中仍应有不少珍本，如新国大所藏明崇祯四年汲古阁本《二十四史》（参看李国庆，2018）。而目前马大与新国大所藏古籍中确实存有不少马鉴藏书，以马大东亚图书馆为例，比如《国朝文录》《鸿桷堂诗文集》《晨风阁丛书》《对山书屋墨余录》《南汉书》《宋

¹⁹ 原文为：‘I purchased books from reputable families and booksellers, and although the latter may have experienced the difficulties you describe in getting some of the books out of China, that is no occasion for either blaming or praising the university or me.’

²⁰ 原文为：‘Since you have chosen to dramatize my scholarly mission, perhaps I may now be permitted to let your readers know something of my more serious intent and something of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library that has now been acquired for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²¹ 当然，目前所知贺氏之个人收藏，不论是唐宋乐曲史料文献，或是后来捐献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佛经，其中都不乏这类珍本乃至“孤本”。

本唐人小集》《皇清经世文续编》《月河精舍丛钞》《山谷集》等，均属于清后期刊本；而各书中之钤印则包括“马鉴”“马鉴之印”“季明”“鄞马鉴季明藏”“马氏老学斋劫余文物”等。而这几部书也都钤印同一日、同一款的马大图书馆入藏章，即“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的蓝印椭圆章，确属马大图书馆1954年同一批收购入藏的图书。

由此可见贺光中所称“向声誉卓著的家庭与书商购置这些书籍”，并非虚言；然而李微尘所提“珍贵的古籍”之相关质疑，却也不是无的放矢。

无论如何，贺光中1954年的这一篇自述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关于马大最初入藏中文线装古籍的最早最完整记录。其中特别强调一些藏品：首先是3648册考古文物类书籍；其次是两部大型清代刊印《周易》注释，分别为480册与680册；再次是1千余册元明刊本与手抄本（Ho, 1954）。其中所提考古类书，据目前马大东亚馆所存属于1954年所购藏者，如乾隆54年《两汉金石记》、光绪34年《陶斋吉金录》、光绪32年《艺风阁收藏金石目》、光绪14年《孙溪朱氏金石丛书》、光绪17年《金文雅》、同治11年《两壘轩彝器图释》等，为数确实不少。

上文提及马来亚大学1953年设立中文系本就有匆忙间“先发制人”的嫌疑，其中文图书馆之古籍收藏更非规划内之举措；因此除了1953-1954年贺光中借时局之便收购的这一批古籍，其后再无购藏古籍之举，乃至于近二十年内中文藏书之整体数量未见扩充。比如1963年时任新加坡大学图书馆主任之华勒（1963）撰文介绍馆藏图书，其云：“华文藏书（十二万卷）虽是一九五三年才开始，但对华文研究方面，已有超特贡献。”另如1967年时任代主任林徐典（1967）也提及：“直到目前为止，已经搜罗了十三万六千余册，其中有不少的珍本书和绝版书，更有一些是价值无比的古籍。”文中还提及1966年许绍南一批七千余册的赠书（南洋商报，1966），至1971年中文图书馆主任林鸿图（1971）乃称“目前藏书总数已接近十四万册的巨大数目”。只是历年众人文中均未提当初1953-1954年所购置的中文书籍就已是“十三万册”，更均未提及当初购书经办人贺光中。

四、1962年以来马大中文古籍收藏与保存情况

1949年马来亚大学创设于新加坡，然而英国政府在1947年筹划之初就拟定在新马各地分设校区，并且最初选定校址为马来半岛柔佛州的新山。1957年马大副校长奥本馨教授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认为星马的大学教育，应该更广泛的发展，光在新加坡设大学是不够的，应该在吉隆坡，可能时在檳城，分设大学的中心。当一九四七年卡桑德调查委员会进行工作时，这一项意见即向调查团提出。但是调查团主张在新山设立一间的马大，并建议将新加坡的马大应该迁去。”（南洋商报，1957c）

其后1953年马来亚大学当局又一次规划在马来亚设校区，当年6月份副校长薛尼爵士曾宣布新山校区的设计蓝图与筹建费用，但所涉建造金额过亿，“如建筑工程分十年完竣，星马两地政府每年须负担千余万元，作为大学新校舍建筑费”（南洋商报，1953d）。这项计划相信在当月薛尼爵士向英政府汇报时就遭否定，如据1955年的报道云：“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乃另草拟新建校计划，去年四月间提出在星隆二地建校

计划草案，本年三月间当局原则上予以采纳。”（南洋商报，1955b）其中提及1954年在新加坡与吉隆坡“二地建校计划”，实际指当年的“发展马来亚大学之白皮书”，其云：“该白皮书赞成在星洲及吉隆坡两地分设大学各学院。”（南洋商报，1954a）

当初原计划理工科院系分设于吉隆坡校区，并暂借吉隆坡工艺学院的校舍上课，“惟由于金钱，理化与工科设备不够，故未能开办各科。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将文科一年级全部迁往联合邦，在工艺学院上课”（南洋商报，1957c）。于是1957年9月21日举行吉隆坡校区第一批学生的开学典礼（南洋商报，1957d）。也就在这同一年，校方确定吉隆坡校区校址为“八打灵卫星市”，即1959年启用至今的班台谷校舍。

1958年8月份，马来亚大学由原计划分设学院，经新马两地教育部长商讨后改成“分为两分校，已是最后的决定”，而马来亚教育部长“佐夏里氏宣称，星马二分校，各有完全自主权，各有完全招生权力，但是颁发学位，则仍共同发给，不分星马”（南洋商报，1958b）。这一决议乃于1959年1月15日生效，规定当日“为新加坡吉隆坡马大设立日期，在吉隆坡方面，名为‘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在本坡则称为‘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南洋商报，1959a）。直至最终1962年1月1日正式分家，报道云：“星加坡与吉隆坡马大乃于本月一日正式分家，而各自成为星加坡大学与马来亚大学。”（南洋商报，1962a）而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也是这一年正式成立。

关于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图书资源，1958年将升为二年级的吉隆坡校区文学院学生就提出“要求明年在星继续第二年课程”，并列举“七点理由”，其中第四点云：“图书馆缺乏参考书。”（星洲日报，1958）而1959年吉隆坡分校图书馆建成，当年图书馆主任布蓝比指出：“目前吉隆坡马大图书馆藏书有一万五千本。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学，这点存书是很少的。这些藏书，包括将近八百本巫文书籍及三千本左右的印文书籍。”（南洋商报，1959c）按当时吉隆坡分校院系设置，巫印文外的应属于英文书籍，相信不会有中文书籍。

1962年正式独立为马来亚大学的吉隆坡校舍，同时也迎来中文系的成立。1962年1月份报道称“国立马来亚大学理事会，经决定敦请现任英国剑桥大学中文系主任郑德坤博士为第一任国立马大中文系主任”，且原定“该系将于今年五月间开课”；此外报道还称郑德坤“将负责聘用该系讲师，购置中文图书”（南洋商报，1962b）。而到了当年2月份，马大副校长奥本馨爵士即公布云“一切准备都有了良好的进展，该系的图书馆也已经设立起来，并且由新加坡大学方面获得了一批赠书，可是数量并不很多”，同时呼吁“热心教育的本邦富有人士，能够捐款或图书予马大中文系”（南洋商报，1962c）。然而此时则基本已确定中文系开课日期改为明年1963年5月，其原因之一乃“郑德坤博士于本年六月杪始克抵步”（南洋商报，1962d）。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初新加坡大学方面便已转移部分中文书籍给马来亚大学，这在当年7月初郑德坤初抵吉隆坡后的第一份访谈中说得较清楚，其云：

新加坡大学与马大尚未分家时，中文书籍相当丰富。由于许多书是从旧藏书家手中购得，许多书是相同的，所以这些书现在已经拨给马大，为数约

有八千本。目前这批书经运来马大，但其目录现在我还未看见。

（南洋商报，1962e）

这位毕业自中国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考古学教授，似乎浑不在意中文古籍与版本，即其讨论此后马大中文图书之购置也着重于书籍的实用性以及当下实际需要，云：“目前中文系的图书馆只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在将来才扩展到研究及美术方面的工作。在初步阶段是绝无问题的，许多中文书都可在吉隆坡、新加坡、香港或日本购得。日本在战后印刷也非常发达，一些过去曾绝版的中文书现在都被翻印出来。虽然其版本有好几种，大体上说我们是可以应付初步的图书工作。”（南洋商报，1962e）

本地大学中文系总能牵动新马华人的心弦。跟当初1953年在新加坡开设中文系一样，1962年宣布马来亚大学开设中文系，也引来马来亚华人纷纷献议，而当年一篇长文不无乐观地谈及马大置办中文书籍，其云：“现代的学术研究，着重图书馆设备。图书的择取便利，自然会增加学生读书的兴趣，及养成著作的决心。据悉，马大每年将播发四万元购买中文书籍。如果本邦的私人藏书家，愿意献赠他们的珍贵中文书，再加上从新转移过来的九千本中文书，那末，几年后，马大中文图书的量与质方面将略具雏型，我们拭目以待吧。”（洁芳，1962）

这里所谓“每年将播发四万元购买中文书籍”，数字远比现实乐观许多。无论如何，1962年马大还是获得了至今最重要的一笔社会捐赠中文书籍，即当年10月13日槟城“已故闻人温文旦哲嗣所赠之鉴古堂珍贵华文藏书，以供马来亚大学华文系应用，计共二千八百五十余本”（南洋商报，1962g）。随后“安顺的黄和庆氏也接着将一百一十册《四部丛刊》，赠予马大中文系”²²。（南洋商报，1962h）

关于温文旦赠书，当年9月初郑德坤赴槟城时就已商定，其采访时说：

此行到槟城之最大目的，是来看一套书。这套书是温开西、开疆、开溟昆仲所藏，乃属温先生等尊翁文旦老先生之遗物。温老先生去世时，对中文之研究，甚为致力，故当时除购有其他之珍贵古版书籍外，还有一套同文版之《古今图书集成》。此套书经由温老先生聘请专人加以签注，亦由温老先生本身写上小序珍藏。此书极有价值。而开西先生昆仲闻及马大中文系需书颇殷，特有意赠送，俾能供有志者研究。²³（南洋商报，1962f）

而正是这部《古今图书集成》，引起了近年来对于马大馆藏中文古籍的些许关注。事缘2012年11月温氏后人托友人去信马大询问关于这部一千余册赠书的保存情况，并附上两则当年赠书报道的英文剪报。然而马大上下，包括东亚馆与中文系均遍寻不获，也未有任何记录。而是到了一年后的2013年10月，一次偶然情况下，“为了配合马大中文系50周年特刊的暂时存放，前几天收拾中文系资料室，意外发现几个箱子内是线装书，打开一看，原来就是一直寻找中的《古今图书集成》”。（宋燕鹏，2013a）

²² 按原文安顺错为“顺安”。

²³ 原报道人名有错误，将开强错为“开疆”、开明错为“开溟”。

宋燕鹏（2013a；2013b）事后写了两篇文章，对温文旦生平及其子嗣做了较详尽介绍，这里另补充一则文献，即1899年力钧《槟榔屿志略》之“艺文志”（1899：卷八五上）曾记温文旦所辑书目《鉴古录》一卷，力钧且盛赞其藏书之丰富与用心，为其书目题跋云：“温君旭初，好书画，收存之，富甲槟城。……物聚于所好，吾知必有以海外书画船目之者。”至于《古今图书集成》，宋文未具体说明其版式，尤其未提及上文所述“温老先生本身写上小序”。此外，宋燕鹏（2013a）还尝试解释“这套书后来几十年到了什么地方，不可知晓”的原因，提出温氏赠书原是给“中文系图书馆”，而“后来中文系图书馆改名资料室，其中温先生捐赠的线装书就多数转移到了中文图书馆，这套《古今图书集成》就保留在这里”。实则当年应该并无“中文系图书馆”之设，且据1962年首任中文图书馆主任王遵侗的说法：“槟城已故闻人温文旦的二千本名贵藏书，也由其子女赠送给该馆。在这批赠书中，有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约有一千多册，是很有价值的收藏。”（刘善庆，1964）可见当初就是直接捐赠并存放中文图书馆，而且当年的“马大中文图书馆刚好与英文图书馆同一座”²⁴，而不在中文系。

总之这部《古今图书集成》算是找到了，论者以为“现在终于可以对槟城温氏后人交代了”（宋燕鹏，2013a），然而温氏所赠其余一千余册古籍却至今仍未有交代。

根据1962年槟城当地报章连日刊载的温氏赠书除《古今图书集成》以外的完整书单，仅其中10月13日所列就已171种（星槟日报，1962），而反观目前马大东亚图书馆目录所示“鉴古堂藏书”则仅61种，另加上2016年检阅这批古籍时补上的6种，还是远不及当初所赠。其实书种且不论，单以册数计算，当初温氏所赠总数2850余册，除去《古今图书集成》一千余册不计，其余古籍应有一千余册，而当下其目录加上2016年所补总数也才400册，仅约当初赠书的三分之一。当然，其中不排除书种计算之差异，如馆内目录所示《咸陟堂文集》十二册为一种，而据1962年报章所列举书目中《咸陟堂文初集》八册、《咸陟堂文二集》四册，则分为二种；此外后文将指出温氏当初并非所有藏书均钤章，而目前馆内目录主要依据之“鉴古堂温氏藏本”楷体蓝印章则可能为后人所加，因此怀疑有些温氏赠书并未列入其目录之“鉴古堂藏书”。比如后文将讨论之力钧钤印《澹静斋说课》，即可能属于温氏藏书；又如1962年报章书目显示“《闽杂记》四本”与“《古文析义》八本”，与目前馆内列于“民国前”分目中的完全一致，尤其《古文析义》更同属于康熙刻本。然而整体情况仍是不甚乐观，即：前一种算法差异仅属个别，应影响不大，何况总册数差异如此巨大；后一种情况则视总数多寡，但初步以1962年报章所列书目与馆内目录对照，其缺漏者十有八九。看来目前馆内目录与当初温氏赠书之总数差异还是别有原因的。

²⁴ 另外，王遵侗称中文图书馆是1963年5月间配合中文系开课才“宣告成立”。然而从郑德坤上任前接收新大转移七千余册中文书籍，乃至1962年底郑德坤统计的中文书籍总量，以及王遵侗本人也是1962年底受聘为“中文图书馆主任”。综合上述种种，似乎还有一种可能，即所谓1963年5月“宣告成立”，指的是正式播出空间与书架成为实体的“中文图书馆”，此前也许仅是存库。无论如何，1962年至1963年之间这些一万五千册中文书籍应该是发生过转移，只是由何处转移至中文图书馆则无法确定；更何况后来1990年代末还从设于总馆的中文图书馆，转移至东亚图书馆。总之，经各方考量，当初不应在“中文图书馆”以外更另架设一个“中文系图书馆”。

此外，同年赠书马大中文系的黄和庆，《南洋名人集传》述其生平云：“年十二，随父南来，初到在太平为工三年，往巴冬宁牙，仍为工一二年，始到安顺，……至民国廿四年，始放弃原业，专营客信汇兑，然已获盈不少矣。为人商才富满，精神活泼。民十八年，任一善社议员；十九年，为副议长；廿一二三等等年，为副总理；廿四年，升正总理。怡保尽心社，亦为协理。安顺白话剧社，为社员。至捐资于各项善举，颇难逐一列出。亦热心爱国者。”（林博爱，1939：91）此外，至少1953年就已担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吡叻安顺支会”的正总务，又任霹雳中华公会领导；而其捐书给马大的1962年，当时他还是霹雳中华公会的产业信托人。（南洋商报，2014）

总而言之，马大开设中文系消息一经宣布，包括捐赠与购置的中文书籍颇有成效，仅仅不到一年的1962年12月总数已达一万五千册。这时半年前仍指“中文系的图书馆只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的郑德坤不无自豪地称：

马大中文系图书，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除了新加坡大学转赠的七千册中文书籍外，另外一千五百册，是于过去两年，在历史系成员的推荐下购买者，中文系曾额外购买三千册以上的中文书籍。檳城已故闻人温文旦哲嗣曾将其父藏书三千册，赠给该中文系。这项赠书仪式，是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在檳城举行，由副校长代表马大接受这份礼物。安顺的黄和庆氏，也接着将一百一十册《四部丛刊》，赠予马大中文系。该系希望得到更多热心人士的赠送书籍。马大中文系在开学时，将有中国书籍一万五千册，其中两千本是用欧洲文字书写。（南洋商报，1962h）

郑德坤对马大中文系的发展是寄予厚望的，他设想将其“办成东南亚华文研究中心”，此外还策划一所“中国文物馆”。虽然他仅逗留马大半年时间，作为中文系创系主任负责规划初期建设工作，但临走前“已向马大提出一项发展马大中文系十年计划”；包括招聘中文系初期的一批优秀教员，以及为马大招来曾任职中国辅仁大学与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王遵侗为中文图书馆主任。（南洋商报，1962h）

这里还得提一下，据检阅所见，1960年代前半段还有两笔赠书值得一提，即1961年5月29日由杨大省为“纪念演本法师弘法南溟”捐赠给马大图书馆的一部分书，数量不大，如同治12年《性相通说》一册；另一笔同样主要为佛学书籍，其书上都题记曰：“Gift: Mr Van Thean Kee, 5.11.1964”。这一批Mr Van的捐书较多，而且书中几乎都有钤印；比如宋燕鹏（2015：90-110）对其中融熙法师的印章与生平做了相当细致的梳理。此外一部《首楞严经疏》中钤有“融秋”印，融秋即在香港给融熙进行剃度的法师。至于捐赠人Mr Van则所知不多，仅知其1939年毕业于怡保英华学校，并获奖学金到英国学农业（Anglo-Chinese School Ipoh, 1949：7），1960年代曾任马来亚农业部官员，1970年代则为马来亚大学研究员。

然而，整体而言马来亚大学图书馆购书远不如当初1950年代初在新加坡时，至1964年“图书馆约有十万本书，现在每年该图书馆的图书增加量为两千本”，而其中“华文约一万五千本”（南洋商报，1964），可见中文书籍毫无增加；即如1964年王遵侗访谈中亦慨云当时馆藏中文书籍“本身购置的数量极微”。

此外，王遵侗访谈中明显忧心于中文图书馆的发展而常怀感叹，如云：“目前该馆的藏书在任何一方面都非常缺乏，需要不断的扩充。”然而“提到马大中文图书馆常年购书费时，王女士说，马大在这方面每年拨出一万五千元左右。她指出，作为草创时期中文图书馆的购书费，这是不够的”；尤其谈到中文古籍，她更是“感叹不已”，云：“在去年，中文书籍，特别是名贵版本，涨价两三倍。因为许多这些书籍已经绝版，加以欧美各国积极教授中文，设立图书馆，所以有许多图书都被抢购一空。她说，这种热门书籍为线装书及清末出版的书籍。”（刘善庆，1964）

曾任职顶尖中文图书馆的王遵侗，其言谈中可想对古籍肯定是有向往的；只是各地大学图书馆纷纷争购收藏乃造成中文古籍价格倍增的同时，马大中文图书馆所得买书费竟连应付实际所需都已不济，她也只好“感叹不已”了。

这位王遵侗实则相当有来头，其父亲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长，抗日时期出任日伪政权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沦为“汉奸”，终于1945年服毒自尽。当年《申报》12月25日报道：“王克敏现在只留下8个女儿，其中一个，是发过宣言和他的汉奸父亲脱离父女关系的王遵侗。”（转引自王桂云，2012）王遵侗因不耻父亲投日，1938年8月燕京大学毕业后只身逃往香港，当时香港报章刊登王遵侗断绝父女关系文章，标题云：《因反对傀儡，王克敏之女到港，已与王断绝关系》（文学城，2017）。王遵侗1962年出任马大中文图书馆主任，钱穆（2005：338）于1965年受邀来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学对其印象深刻，同期在马大中文系的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陈启云教授也曾回忆：“王遵侗女士处理图书馆中文部筚路蓝缕以启先河，替马大图书馆打好日后的根基。”（何丙郁，2006：80）1968年，其师从马大中文系傅吾康教授完成的硕士论文《千顷堂书目史部考证——黄虞稷》，备受征引，包括费正清著《剑桥中国通史——明代史（上卷）》等。而据敦煌学专家台湾苏莹辉（2016）记述，他与王遵侗于1968年马大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亚洲史学会会议”共同出席，当时王遵侗身份仍是“中文图书部主任”。

于是当1971年报道马大图书馆中文藏书四万册，且当中不乏珍本，包括胡适手抄本《水经注》；更尤其考虑到1964年报道马大图书馆一年也仅“图书增加量为两千本”，而中文书籍能有如此数量与质量的提升，这应都归功于中文部主任王遵侗在较苛刻条件下的辛苦经营。1971年报道中文图书馆藏书云：

华文部：完全负责管理中文图书。藏书相当丰富。古代珍贵的书本，也颇有收集，如善本书，价值连城，听说现在已经绝版了，是研究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材料。清版的线装书，是本部古书中收集最多的一种；能有此成就，可说难能可贵。手抄本如胡适之的《水经注》等，也被搜罗于本部。……此部在收集华文材料方面，可以说相当成功。只可惜借阅华文书籍的人少得凤毛麟角。（南洋商报，1971）

其中一再强调的古籍珍本与手抄本，可想就是王遵侗自1960年代初就极为关注的，即上文引述其“感叹不已”者。而文中指出用书的人“少得凤毛麟角”，可见后来这一批古籍之损毁丢弃，此时已见端倪；关键还是无识荆者，乃至弃之如敝屣。

综合当时政治与社会因素分析，尤其中文系1960年代末以后的变化情况（参看何丙郁，2006：74-107），这一批中文古籍入藏时间较可能是1964-1969年之间。

另外，还值得提的是，王遵侗此时入藏古籍中古代数学类数量相当突出，例如上文曾列举馆内目录缺漏书单中的《数学精详》《社盟算谱》《五明算法前集》《算法古今通览再补》《拾机算法》，又如目录所见咸丰4年《衡斋算学遗书合刻》二册、同治12年《学彊恕斋笔算》五册，以及和刻本《算法极形指南》三册；再如属于“民国后”的1933年《书算大全》八册、1957年《四部总录算法编》一册。与此相关的天文历法类古籍，如上文举过的《授时历图解》《天道溯源》，以及同治间《钦定授时通考》与光绪28年《钦定授时通考》二种，又有手抄本《钦定仪象考成》。这些书中均钤印“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篆体朱文章，下文将分析这是王遵侗入藏古籍时的中文图书馆公章。如此数量的数学与天文历法类古籍，并非一般服务于中文系的中文图书馆所常见；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1964-1973年领导中文系的何丙郁。何氏作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成员及作者，研究领域就是中国古代科技史，更具体而言则“特别是天文学、数学、化学、医学等方面。”（黄兆杰，1981）因此这批书极可能是经何氏授意图书馆添购，由此亦可见当初中文系与中文图书馆间之互动与配合。

1971年后的数十年几乎再无多少中文图书馆的资料与报道。唯一可提的是1983年一位吉兰丹华裔买下檳城何克柔生前藏书共69种，捐赠给马大中文图书馆。关于何克柔其人及赠书过程，宋燕鹏（2014）作了较完整的论述，且指出何克柔本身爱好文学并进行创作，因此藏书以文学类为主。这里还需补充目前马大东亚图书馆目录所示，“何克柔藏书”一共55种476册；虽然经过重新整理数量比宋燕鹏所记略多，但当初所捐赠的69种还是有所遗失。

1999年，马大撤销总馆内的“中文图书馆”，并将中文书籍全部转移至扎巴纪念图书馆大楼内的“东亚图书馆”。目前为马大图书馆副馆长的许爱萍，当年作为唯一华人馆员，刚入职不久即负责搬迁这一批中文书籍。据其口述，当年这批线装古籍杂乱堆置于一个个书柜内，望去满是霉尘覆盖的古书，许多均已破损，虫蛀严重乃至碎成粉末。由此足见数十年来无人打理，遑论保养。尤其当年新入职，对线装古籍丝毫没有认识，按照一般图书管理程序即将一些重度损毁的古籍丢弃；据称丢弃数量不少，只是记忆模糊，当初又未著录，未敢确指。²⁵

这批劫余幸存的中文古籍，目前点算总数约五千册。近四十余年来毁弃了多少已无从追索，包括那部胡适手抄本《水经注》也了无踪迹；更其馆内对这批中文古籍的来龙去脉竟无片言只字的记录，连丢弃的古籍亦未著录登记，且馆内管理与用人制度问题导致今日无人能诉其由来。更遗憾的是，1999年迁出旧馆后就堆放于扎巴纪念图书馆大楼四层“东亚图书馆”的开放书架之中，十余年间任人随手拿取翻阅；且楼层管理并不严密。2015年1月，配合台湾国家图书馆的合作，东亚图书馆新聘一位中文馆员兼任管理这批线装书；自此将线装书移至底层一个角落紧锁的房内，并重新检阅整理其线装书目录。2017年初新聘馆员离职，其后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至2018年4月才又另置一位专任馆员。如今这批古籍仍搬回四楼东亚图书馆，其中部分开架。然而自2016

²⁵ 许爱萍访谈时间为2016年4月中旬，地点为马大附近之餐食，同时还有时任东亚图书馆中文馆员吴雪雯。

年以来，至今更无人再去整理那批古籍及其目录。²⁶

2016年检阅其原有目录，发现不少缺漏与错置；其目录并不著录版本版式等信息，不合格格。当时检阅目的主要还是确认书种数量，只是时间太短，又多间断，仅完成检阅其“民国前”书种之近半数，其中就见35种282册漏记，另还有“民国后”6种24册。由此便可推知，当初台湾合作后架设的网络版《中文古籍联合目录》所示“马来亚大学图书馆”竟然仅仅283部。实际上，更堪忧的是其中许多书籍已严重残损，尤其虫蛀与风化，亟需修复保养；虽然2016年购置了一些书盒加强保存条件，但目前整体存放环境与条件仍然欠佳。²⁷

五、马大图书馆中文古籍钤印概貌

就在1958年新马两地马大校区分为“各有完全自主权，各有完全招生权力”的独立分校之际，马来亚大学吉隆坡校区主任马逊教授即发言警告：“联合邦的教育政策，不应以执政党的转移而时常改变，否则将会引致混乱，同时，将马来亚引入迷路。”他在谈话中说“教育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但一再强调：“我指的政治，并不是政党的政治。”（南洋商报，1958a）

回顾马大中文系与中文图书馆的整体发展，不得不感觉马逊当时的讲话意味深长。即以马大图书馆馆藏中文书籍数量为例，1960年代初哪怕是创建时期的惨淡经营已如上引王遵侗的访谈；至如1971年数量增加，实则也是搭乘整体急速发展之便，即马大图书馆从1964年的总量为10万册急增至1971年的40万册（南洋商报，1971）；饶是如此，中文书于此7年中添购约2万余册，自然不能与巫英文书籍增幅并论。实则最不堪的是对此中文书籍的保存与管理，竟至数十年遭弃置以饱蠹鱼，直到1999年才由一位刚聘来且毫无文史训练的年轻华人新馆员负起迁移这批中文古籍的严峻任务；连番厄运，甚且对于丢弃这些典藏古籍亦未进行记录登簿，直如敝屣。

这连串发展，实应联系于何丙郁（2006：80）所述中文系1970年前后由于政党政治因素干预所起的变化；如其引述陈启云不无感慨的回忆称：“马大中文系创始的前几年，系中先生都是以客卿身份，与政治无所干预，个人学术背景虽然不同，教学的目标则一致，加上没有利益纠纷，大家相处十分和洽。”而其本人亦发慨叹云：“可惜昙花一现，陈启云离开马来亚大学两三年后，情况就改变了。”

于是，随着马来西亚社会起始于1970年前后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这一批静卧于马大图书馆内的古籍也“书厄”难逃；历半世纪之无人问津，尤以措置失当，明人谢肇淛

²⁶ 2020年5月本文初稿甫就，与时任东亚图书馆中文馆员罗立勤联系，据其自称2017年初接替离职馆员入职，但先派在总馆“红楼梦研究资料中心”，2018年4月才调至东亚图书馆；又目前这批古籍已搬回四楼原东亚图书馆，其中主要为“民国后”书籍置入开架，其余则置于同楼层的一个小房间内。

²⁷ 以2016年检阅目录时所见言之，存放这批古籍的角落房间不通风，闭塞潮湿，一般即使图书馆上班时间房间内也不开空调。2016年下半年添设除湿器，但却是水气存入机器内部的构造，而且经常无人打理；于是曾发生积水过多致使外漏，约半个房间的地毯几成“水毯”。此外，入门首排书架一端临近一座自来水管的洗手盆，其图书馆馆员不时在那里漱洗，且毫无顾忌地挥动湿着的双手，完全没有保护书籍的意识。凡此书籍状况及其保存条件，2016年任职马大期间曾多番汇报于马大图书馆与中文系，并提出建议，惟其意不在此。

称“书画有七厄”之云“朱门空锁，杨笥凝尘，脉望果腹”“目不识丁，水火盗贼，恬然不问”，其谁谓不然。

至于今日甚且书籍来龙去脉之原始记录亦荡然无存，就连目录也错漏迭出。比如《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六册，其馆内目录定为1939年，著录于“民国后”分目中；然而查其版式为半框17x14公分，十行十九字，黑口，左右双边，书名叶题“海上曹敬三重订”、“城书室藏板”，版心下端刻“城书室”，手书上版，字迹清晰，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所录康熙刊本一致（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2009：133）。尤其珍贵者乃其品相完整，毫无损伤，且钤有多方藏印，包括清末扬州著名藏书家测海楼的吴引孙、汪精卫侄儿汪希文、20世纪香港著名书法家韩云山，足见传承有序，其后则于1954年由贺光中收购入藏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最终乃1962年转移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又《钦定授时通考》廿四册，书前序文落款“乾隆七年”，于是馆内目录定为1742年；实则书名叶背面一行小字清楚写着“江西书局敬谨重修”，显然是同治以后的官书局重刻本。

再如万历年间《新增格古要论》四册，其馆内目录列为1896年，实则全书“玄”字均不缺笔避讳，遑论“弘”“宁”字；按其版心刻“吴应芝梓”，书名叶题“新增格古要论”，并有“淑躬堂藏板”字样，书前为写刻曹昭原序及舒敏序，并有凡例与新增凡例。这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料室与《续修四库全书》影印辽宁省图书馆之所藏明本一致（孟原召，2006）。同时本书还钤有嘉道间浙江山阴的学者兼藏书家杜煦的印章“山阴杜氏知圣教斋藏书”，另有一章“会稽梁氏珍藏书画印”，未审何人，然查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康熙内府本《佩文韵府》所钤“会稽梁氏敬恩堂藏书印”，应属同一人。（清华大学图书馆编，2003：211）

又如清代中期《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十六册，馆内目录注云“[1368-1644]”，即当作明刻本，实则书中明显“玄”“历”字均缺笔避讳，其书名叶题“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另有“江陵邓氏二房藏板”，正文则题曰“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新刻张太岳先生诗集”，按其版式跟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本与明刻清修本一致：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清华大学图书馆编，2003：12）；只是此二本均无“江陵邓氏二房藏板”字样。此外另据近期新印校勘本意见，认为是“道光初年江陵邓氏覆刻本”（潘林编注，2014：2）。无论如何，按避讳字判断，则应该是乾隆以后印本无疑。

当下检阅这一批劫余幸存后犹无处安置的中文古籍，遥忆初始草创之人事与时局，乃考镜其聚藏存废之源流；尤以书叶间钤印所示聚书人之饥读当肉、寒读当裘，更感其馆藏人之悉为著录以“保存文献”之用心。

目前所见，马大东亚图书馆古籍中的钤印大致分为二类：一、图书馆之公章；二、藏书家之私章。

（一）图书馆公章

首先，我们查阅的古籍中仅少量几部是完全没有图书馆公章的，如乾隆41年《河洛精蕴》四册、康熙55年《古文析义》八册、光绪28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廿四册、道光26年《圣武记》十二册；又如和刻本宽文9年《阙里志》二册。

其余则均钤印至少一种马大图书馆的入藏公章，按其样式有如下七种：

表1：马大东亚图书馆所藏古籍之图书馆公章种类

序	印章	样式	备注
1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3Nov1953	蓝印，椭圆	日期居中
2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Sep1955	蓝印，椭圆	日期居中
3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蓝印，椭圆	中间留空
4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	朱印，正方框	竖三行
5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	蓝印，长方框	竖一行
6	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蓝印，长方框	竖一行
7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蓝印，无框	横二行

第1-3种图书馆章都是1962年书籍转移以前在新加坡盖上的，而第4-7种则是在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从形制上判断，属于蓝印者应是橡皮章，因此唯有第4种“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才是传统意义的藏书章，而且字体也是唯一使用篆文的。至于各公章的数量比例，依据目前检阅的总量而言，第2类与第4类几乎占绝大多数。以下我们分述：

先谈新加坡钤印的三种公章。第1-3种图书馆章的形制是一致的，都是椭圆形，其中“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是环绕轮廓展开，“Singapore”在正下方，而中间的空位则印上日期；第3种则中间留空。其钤章位置还是很有规律的，第1-2种的位置是在每册首叶的顶部，而第3种印章则是在封皮上。从印章性质上来看，第1种和第2种明显是分别相应于贺光中最初进行的两次购置中文书籍，即1953年8月与1954年10月。由此亦可想见当初对于这批古籍之入藏与著录程序都十分严谨；当然还应提出第1、2章在书叶顶部的位置不是很固定，时左时右，甚至很多都有倾斜。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这一批古籍都是最初贺光中所购入的，而且属于1962年马大与新大分家时转移至马来亚大学的七千余册中文书籍之中。

具体分析，第1种公章志期为1953年11月13日，而根据上文所述，当年11月6日“首批三十六箱业已运到”，且“预算在此后十天中，尚有一百五十九箱自日本运到。过后，更有甚多将自香港运来”（南洋商报，1953j），可见当年书籍运抵新加坡后图书著录的工作非常及时，当然也可以假设工作以古籍为优先。其中不乏珍本，如光绪17年《古诗源》四册，每册钤印“伍耀光印”白文章、“翰良”朱文章，尤其全书点逗与书眉题记分朱墨二色，题记非常多，小字精美；再如嘉庆年间刊本《复古编》三册、道光4年《历代帝王年表》三册也同样刻印精美。

其次第2种公章，志期为1955年9月12日，则是1954年10-11月贺光中到香港购买的一批书。其中珍本较多，如康熙年间刊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六册，上文已提过乃古籍善本，此外如乾隆54年《两汉金石记》八册、道光17年《随轩金石文字》四册、同治11年《两壘轩彝器图释》六册等均是精美图录，又道光13年《文心雕龙》四册为朱墨双色套印。最后，上文提过这一批古籍里有不少马鉴藏书如《国朝文录》等十余种。其中光绪2年《茗壶图录》二册，扉叶题记云：“二十四年十月南游过沪，

张君伯岸以此见赠，志而藏之。季明。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香港青年舍。”另有同治11年《稽古录》封皮题记：“季明先生惠存，后学唐园唐祖振敬赠，己丑秋月客香港。”并有“唐”“园”朱文与白文各一方印。二书题记落款恰是马鉴二度执教香港大学的时间点。此外，还有个别第2种以外还盖上别样公章的，如道光12年《吾学录初编》八册，同叶上还盖着第4种“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公章；又如光绪8年《南巡盛典》八册，除了同叶盖有第4种公章，个别一二册还盖着第6种“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公章。

第3种公章的使用规律不明显，似乎仅见于较少量盖有第1、2种公章的古籍，如上引《随轩金石文字》，另如道光9年《南汉书》八册、光绪21年《弘正四杰诗集》十六册、光绪23年《朱九江集》四册、宣统3年《霜红龕诗钞》一册，其余则有些原章大部分被新帖索书号贴条所覆盖，据推测应属于第3种公章，如上文提及的《历代帝王年表》，又如光绪元年《梅窝诗钞》一册、光绪32年《艺风阁收藏金石目》八册、同治3年《鸿梅堂诗文集》四册、光绪9年《王子安集注》六册、光绪13年《六朝事迹类编》二册。而目前所见第3种公章较少的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曾经换过封皮，如光绪10年《国朝学案小识》十二册就比较明显。此外，还有个别是非常规位置的，如光绪19年《戴文节画记》六册，盖在第一册书内序的首叶；《两汉金石记》则封皮外还盖在第一册正文首叶框内右下角；《随轩金石文字》亦同样封皮以外也盖在第一册正文首叶。

再看吉隆坡钤印的公章。第4-7种公章中，第4种占绝大多数；第5、6种仅见于个别古籍中，第7种数量略多，但也远不及第4种。据目前推测，第4种为篆体“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公章，形制上属于较标准的藏书章；这应该是1960年代王遵侗主持中文图书馆时所入藏，即1964年1万余册中文书籍增至1971年4万册之时（南洋商报，1971）。其中珍本不少，计明版如上文提过万历年间《新增格古要论》，又如万历34年《金罍子》八册、万历39年《路史》十六册、万历42年《宪世编》十六册、万历45年《东西洋考》四册，其书中“玄”“弘”“宁”等字均不避讳，而且都有多方私人藏书章；尤其《金罍子》书眉题记非常多，分朱笔、墨笔、蓝笔。此外清三代的有多部，如康熙27年《日下旧闻》廿册、康熙56年《增订广舆记》十六册、康熙57年《隶辨》八册、雍正13年《格致镜源》卅二册、乾隆55年《古学千金谱》十册，其中《格致镜源》“玄”缺笔避讳，但不避讳“弘”“宁”等字，且通书朱笔点逗。此外，还有如乾隆59年至嘉庆元年刊印的《龙威秘书》八十册、嘉庆7年《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一册、道光元年《练兵实纪》六册、道光6年《钱志新编》四册、道光11年《两浙金石录》十二册、道光17年《隶篇》廿册、道光22年《生生编》四册、咸丰7年《海国图志》廿四册、同治12年《吴郡图经续记》一册，都刻印精美。

这一批藏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和刻本数量显著，如宽永12年《博物典汇》六册、宽正5年《刘向说苑纂注》十册、元禄7年《世说新语补》十册、天明5年《毛诗品物图考》五册、天保4年《东华录》十六册，另有明治、大正时期刊本若干。此外，即使一些中国古籍也有很多是日本藏家旧物，即上述《东西洋考》《格致镜源》《古学千金谱》《宋王复斋钟鼎款识》等均是的。比如《东西洋考》每册封皮钤印“子孙永保 / 云烟家藏书记”，这是日本江户晚期著名书画鉴赏家安西云烟（反町茂雄，1979：325-

329)。又《格致镜源》钤有“庆应义塾图书馆印”“宝玲文库”“集义斋”“高罗佩藏”，第一章即表示原藏于日本庆应大学，第二章乃英国旅日藏书家Frank Hawley，“宝玲”日语音近Hawley，其藏书1961年由日裔美籍学者坂卷俊三代夏威夷大学收购，并结合自己收藏，成为美国所藏琉球史料之冠（van Gulik，1960）；第三、四章均属于著名汉学家兼外交家高罗佩，1961年Hawley逝世当年撰写且是目前研究Hawley生平最重要论文的作者Robert van Gulik就是高罗佩；而1961年高罗佩正作为荷兰大使身居吉隆坡。此外还有一部光绪17年《藏书纪事诗》六册，钤有“庆应义塾图书馆印”与“宝玲文库”二章。再如《古学千金谱》所钤“无碍道人藏书”“无碍庵”“也轩读本”均属于日本20世纪初美术教育家今泉雄作；《宋王复斋钟鼎款识》钤印“向黄村宝藏印”与“三十五志山房”“中川氏藏”，前者属于日本近代汉诗人向山荣，1882年黄遵宪调离日本，“于上野八百善设宴与日本友人告别”，向山荣便是其中“应招来者”（高平，2017）；后二章则属于日本20世纪初政治家、教育家中川小十郎的藏书章，他也是目前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创办人。另如咸丰4年《衡斋算学遗书合刻》二册，上钤“唐学斋”朱文印，这属于日本誉为“汉学泰斗”的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吉川幸次郎的藏书印；再如嘉庆6年《泰山志》十册，钤印“蓄堂游清所获”为日本明治时期汉学家兼汉诗人结城蓄堂，其诗作常见于《盛京时报》，并与中国诗人多往来，如《陈衡恪诗文集》载1906年〈赠结城蓄堂〉、1908年〈次韵结城蓄堂社头松〉二诗（孙浩宇，2016）。此外，和刻本中如安永8年《博物要览》四册，钤印“有水可渔”“蜗牛庵”，属于日本20世纪之交的学者兼著名小说家幸田露伴，其与同时代尾崎红叶共创日本文学史上的“红露时代”。（刘崇稜，2003：353）

第4种公章的又一特点是盖章手法很整齐统一，即全都是封皮、书内首卷首叶、书末，而且每一处盖章位置都很标准：封皮在偏右上角、首卷在右上角框线外、书末在框内左下角。例外很少，如上文提的《格致镜源》卅二册、同治间《钦定授时通考》均卷首盖章位置都在框内右下角，书题下方。这一公章整体形制与手法是符合传统藏书章钤印惯例的。

另外，钤有第4种公章的古籍也有同时盖上其他公章的，如上述《东西洋考》每册第4种公章均依规律钤印，即封皮、首卷首叶、书末三处，此外还盖着第6种公章，只是并不规整，原则上仅见于第一、二册。另外，宣统2年《广印人传》四册，除了第4种外，书名叶还盖有第7种公章。

第5、6种公章形制完全一样，为蓝印带框长方形竖一行楷体字，同时其盖章位置也基本一致，即书内首卷首叶，以及书末；于是综合分析，这应该是1999年迁移至扎巴纪念图书馆大楼内的东亚图书馆时同时期新盖的印章。其钤印位置基本是在版框与书脊间的窄小空档中。当然，目前检阅古籍中盖上这二种公章的非常少，其第5种仅二部，为道光9年《皇清经解》卅二册、道光22年《宜稼堂丛书》六十册；第6种除了上述《东西洋考》，还有同治7年《春秋左传》十二册，单独盖上此章的则仅见一部民11年《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十六册。其中《春秋左传》为鉴古堂藏书，各卷首叶框内右下角均钤“槟城温氏藏书”朱文方章，而第6种公章则钤于各卷卷首书题之下；其中第22卷卷首在书题下另钤“陶然楼主”朱文印、“墨磨人”白文印二方私章，而第6种公章之“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蓝印竟在同一位置上直接覆盖于此二章。最后，

这二种公章均属同时期由于书籍迁移而钤印新章，但何以竟出现两种，则暂时无从推论。

第7种公章数量也不多，更关键是其盖印方式欠讲究，大致是首叶的书眉，但位置不固定，经常歪斜，如同治11年《金石识别》六册、光绪10年《史姓韵编》十六册、光绪30年《封泥考略》十册；有时盖在书名叶上方，如道光初《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十六册、光绪28年《长安宫词》一册，甚至有从中间横过书名叶，几如封条，如光绪33年《映庵词》一册、光绪10年《射雕词》一册、光绪12年《汇刻书目》廿册。正如上文所述，第7种公章应属中文系，而非图书馆；其钤印时间目前推测应是1962年中文系初创，或许中文图书馆仍未建设齐备而匆匆以此钤印，如温文旦赠书中咸丰3年《四书经注集证》十二册，书内首叶就盖着“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最后，第4-7种公章还经常会与两种方框盖印同叶出现，即马大图书馆库存编号登录的记录，一方写着“MVC NKS”、一方写着“ISIS UNIMAL”，有不少在“ISIS UNIMAL”方框内手写上编号。这个库存编号印基本不太见于第1、2种公章的古籍，甚且第4-7种公章古籍也有一些是未盖此印的。但无论如何，这应是1962年分家之后马大图书馆的图书登记方式，然而却似乎挂一漏万之嫌。还有就是盖印方式也欠严谨，经常是东歪西倒，而且显得凌乱，如上文举过的《隶辨》《隶篇》《史姓韵编》等，其中《隶辨》是直接盖在书名叶上，类似情况还如同治3年《古泉汇》廿册、光绪34年《钦定西清古鉴》廿四册。此外，还有个别是只盖上这两种图书登记公章，而无其他公章的，如嘉庆2年《薛氏钟鼎款识》四册、道光15年至咸丰5年刻成的《竹柏山房十五种》四十册。

上文我们已经提过新近贴的索书号贴条，覆盖了封皮上原来1950年代的旧章，实则应属于同时期贴上去的条码贴条，其处理方式也欠妥。这些条码较多贴在书名叶上，有时甚至是从中间横过书名叶，穿梭于文字之间，如上文举过的《随轩金石文字》《练兵实纪》，又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则是条码遮住了书名叶上的部分图像；有时贴在框外，但却歪斜着部分覆盖了框线，如《汇刻书目》，以及同治初《当归草堂丛书》六册。

（二）藏书家之私章

马大东亚图书馆古籍入藏前的藏家私章相当多，而且很多是颇具分量的人物私章，这部分显示了当初入藏时选书上的用心。实则我们上文已经谈过一些，包括马鉴旧藏及其钤印；尤其介绍了日本藏书家的私章。1962年以后和刻本的收藏较显著，或许与王遵侗1964年感慨中文古籍涨价有关（刘善庆，1964），即以马大图书馆中文书籍的有限购书费，和刻本价格低较适宜。

上文曾以《格致镜源》之钤印为例，追索其由“庆应义塾图书馆印”与“宝玲文库”而“集义斋”“高罗佩藏”之高罗佩，最终1960年代落户“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的历史传承过程；其间高罗佩于1959-1962年任荷兰驻马来亚大使，多番受当地华文报章采访。1961年Hawley在京都逝世后，夏威夷大学坂卷俊三立即飞往日本洽谈，终以20万美金尽收“宝玲文库”藏书，入藏夏威夷大学图书馆为“Sakamaki-Hawley文库”的主干，据其馆员岩渊祥子所列Hawley原藏书902件（Iwabuchi Sachiko，

2019)。实则马大目前所藏几种，包括上述《格致镜原》与《藏书纪事诗》应都是坂卷俊三到日本以前就已转手者，包括转手于高罗佩；尤其考虑Hawley与高罗佩均在1948-1951年间任职于东京，二人对东方古典文化的共同热爱成为其交友的基础。

实则日本藏家旧物在贺光中当年购书中也有，比如上文举过的1954年入藏之《弘正四杰诗集》，其钤印“槐南诗精”属于日本汉诗人森槐南，其与结城蓄堂交友颇深，跟中国文人亦常往来，黄遵宪赞誉之“直东京才子也”。（孙浩宇，2016）

此外如上文提及的《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书中钤印有吴引孙“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以及汪希文“汪希文印”与韩云山“曾在依云楼”“云山”。吴引孙为江苏仪征人，光绪间官至军机处章京领班，其测海楼藏书8千余种，含善本166种，尤以通俗小说最具特色。1930年由富晋书社的上海分社购藏，并编有《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四册。藏书印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测海楼珍藏”“吴氏引孙藏书”等（潘建国，2003）。按推测本书乃由测海楼转至汪希文手里；汪希文为汪精卫侄儿，日伪政权时期曾任行政院参事，“晚年流落香港”（蔡登山，2018：98-100）；至此则为香港韩云山购藏。韩云山为香港著名书法家，1923年出生于广州，1950年到香港，贡献于香港书法艺术的发展；韩云山收藏印章，存有20世纪初香港篆刻界“香江五老”之二人冯康侯、卢鼎公各数十方刻章。本书中韩云山的二方钤印确实精致，至少其中“云山”一章确定为冯康侯所刻。冯康侯出生广东番禺，1950年亦移居香港，《广东印坛三百年》评其刻章“俊逸之气，扑人眉宇，所刻圆朱文印，娟娟静好，最得鉴赏者珍视”（转引自陈永正，1994：307），这一方“云山”印章正是两个圆形构成的葫芦状。此外有趣的是，1957至1962年间韩云山在槟城韩江中学任教，也正是这时期才与同在槟城的卢鼎公相熟（刘泽光，2013：64-94）。本书为贺光中1954年赴香港访书时购入，1962年其旧藏由新加坡转移至吉隆坡马大中文图书馆时，韩云山仍在槟城；如槟城著名文人萧遥天（1979：43）送别韩卢二人的诗作《送鼎公云山归香港》即志期：“癸卯，一九六三，槟城”。

其实整体而言，这批古籍钤印私章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港粤地区文人群体的渊源，包括前述之马鉴、韩云山，以及下文将提及的陈庆保、林逸圣、高学廉、莫伯骥等人；又如光绪19年《梅窝词钞》一册与光绪3年《酉阳杂俎》六册，书中钤印“叶大綽”“补拙斋”则属于光绪10年出任广东学政的叶大綽；再如光绪15年《岳雪楼书画录》五册中钤印之“秋晓庵印”乃清末广东番禺藏印世家潘仪增，此印章乃清末篆刻大家黄士陵作品。实则本书之“岳雪楼”即清末广东著名藏书家“南孔北方”中南孔广陶的藏书楼。本书购置于1954年，贺光中当年所购置古籍中另有《海山仙馆丛书》，“海山仙馆”即道光时期广州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的藏书楼。

在此根据检阅所见之藏家私章进行列表附录于后²⁸，以略示其古籍之聚散源流；以下择要以论其一二。

首先，温文旦“鉴古堂温氏藏本”为竖排一行无框的墨色楷体章，很多都未另钤图书馆公章；更重要是其钤印方式欠讲究，主要在封皮右下方，有时在扉叶或者书末，常略歪斜。总之不甚合乎传统藏书章的规格。此外，属于温文旦之个人藏书章，尤其

²⁸ 见附录。为省篇幅，表中完全相同钤印者则仅列一部。

二方朱文方印“槟城温氏藏书”“陶然楼主”，则篆刻精美，钤印讲究。因此上文提出怀疑“鉴古堂温氏藏本”乃后人所加。

至于其书中的别样私章，如同治12年《三山同声集》二册，所钤“轩举过目”印章属于力钧；他是清末著名中医，光绪时曾任御医，更关键是他曾在新加坡、槟城等处行医，且在槟城与当地文化界过从甚密，并于1899年完成《槟榔屿志略》。力钧与温文旦交谊颇深，且曾为其在中国购置书画（力均，1899：卷八五上）。根据本书钤印来看，另一部钤有“轩举过目”印章的存一册之《澹静斋说课》或许也应为温文旦原藏，这已在上文说明；此外，本书作者龚景瀚，乾嘉间闽县人，官至知府，这也符合“温先生偏爱福建籍人所作”（宋燕鹏，2013b）的藏书特点。

另外，上文已提及的同治7年《春秋左传》十二册，书中卷首框内右下角钤有非常精美的“槟城温氏藏书”“陶然楼主”“墨磨人”三方篆文章。前二为朱文，明显为同一人所篆刻，且据力钧〈陶然楼记〉（1899：卷五十三上）云：“及游槟城，温君旭初招饮寓楼，楼亦以陶然名；观瞻之壮，收藏之富，朋友之盛，觞咏之欢，如居京师时。”可知“陶然楼主”即温文旦。后一方为白文章，则暂时未敢确定是否属于温文旦。

其次，上文提及《宜稼堂丛书》，书中钤印“瑞安孙氏逊学斋藏书记”“中容点勘”二章，分别属于清末著名学人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孙诒让为清末著名经学家，属于清代考据学的殿军人物，梁启超（1998：11）赞誉之云：“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

同样父子相承钤印的还有清末至民国的谢钟英、谢利恒父子；上文曾述及之《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共有八种私章，分属谢氏父子，计为：一、谢钟英之“清光绪时武进谢钟英先生手批书籍”“东山后裔”“澄翁六十后怡得记”“清光绪武进谢钟英先生之手书也”“澂斋藏书”；二、谢利恒之“民国廿八年武进谢利恒先生装订之”“中华武进谢利恒校读之记”“民国廿八年武进谢利恒重装校读记”。谢氏父子为江苏武进人，谢钟英为光绪年间的实干派官吏，曾任张之洞幕僚；谢利恒继承家学，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中医学家之一，民国间曾与废中医论者抗争，1921年编成首部中医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晚年纂成《中国医学源流论》（南东求，2011）。按谢钟英生于咸丰5年、谢利恒卒于1950年，父子二人前后约一百年的传承，最后则落户于马大东亚图书馆；只是其书公章盖着“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据上文推测应属1962年中文图书馆架设完备以前入藏，只是未敢遽定。

再次，陈庆保旧藏品有几部，包括上文已提及《皇清经解》《当归草堂丛书》《王子安集注》，另有嘉庆19年《本事方释义》四册、1916年《适园藏书志》六册，这些几乎都是1954年贺光中所购藏；书中钤印包含数种：“陈庆保”“保泰持盈”“哲如陈庆保藏书”“敬慎寡过，明哲保身”“喆如”。陈庆保出生于广东番禺，他是香港中医教学开拓者，1917年创立香港第一所中医学校“庆保中医夜学”，以所著《伤寒类编》授徒，弟子众多，如邓梦觉乃成为“岭南一代名医”。另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康熙刻本《渊鉴类函》钤有“哲如陈庆保藏书”“陈庆保”二方印（王世伟等编，2001：164），与马大图书馆所藏略同。此外，《适园藏书志》另钤有“东官莫氏五十万卷楼”印，这属于20世纪初广东藏书楼之冠“五十万卷藏书楼”主人莫伯

驥；其人与陈庆保同时代，学西医，1937年到香港，后移居澳门，其藏书多随往澳门（吴志良、杨允中编，2005：271）。另外一部《王子安集注》还钤有“萧山范氏藏”章，未审何人。然而查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刻本《旗亭记》亦钤此章，另有“廉让旧藏”印，据此而同馆所藏明本《秦汉文钞》钤印“萧山范氏廉让世居珍藏书画印”，同时书中有“范经晖题识”（清华大学图书馆编，2003：239、374）；这或许是一条线索。只是范经晖其人遍寻无获，惟其或属湖北望江廉让堂范氏这一大宗族之支系。

又次，旧藏书种量较大且钤印也较多者另有高学廉、林逸圣。据检阅所见，属于高学廉旧物者如上文之《两汉金石记》，以及光绪元年《功顺堂丛书》廿四册、同治12年《两壘轩彝器图释》六册，其钤印包括：“韞岑藏书”“澄海高氏经籍记”“澄海高氏玉笥山楼藏书之章”“岭东高氏玉笥山楼图书”“高氏收藏”“韞岑秘笈”“高氏家藏”。高学廉，字隐岑，原籍广东澄海，父亲高满华泰国经商致富，高学廉乃多寓处香港并拥资聚书画典籍、结交文人政客，包括上文提及汪希文的父亲汪兆镛与溥仪之师梁鼎芬均交谊甚厚，可见其政治倾向。香港著名掌故作家高伯雨为其侄儿，所著《听雨楼随笔》记高学廉事迹甚详，其云：“玉笥山楼是我的八叔父蕴琴先生在香港的寓所，地址在巴炳顿道，一九一七年建筑落成，是一所有花园的大洋房。蕴琴公好客，喜欢和文人往还，因此在香港的一班翰林公以至斗方名士都乐意和他做朋友。他和溥仪的师傅梁鼎芬也是相识的。”高学廉最为人们乐道者莫过于广州书肆中抢救回陈澧遗稿，并携至香港请人誉录；后来事未竟而原稿归于北京图书馆，其身后藏书分归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包括陈澧遗著的部分誉录稿。此外，高伯雨还称“蕴琴先生所藏的兰亭有二百二十四种，吴昌硕、徐星洲、童大年均为刻‘二百二十有四兰亭’朱文、白文印”（转引自王建亮编辑，2016），堪称历代私藏之冠。其身后玉笥山楼藏书多归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如清抄本《法帖释文》所钤“玉笥山楼虞藏书”“澄海高氏经籍记”“澄海高学廉”“字衍圣号韞言”“韞岑藏书”（王世伟等编，2001：119），与马大所见藏印有所异同。

接着是林逸圣，其钤印古籍包括上文已提及的《霜红龛诗钞》，另如道光13年《文心雕龙》四册、光绪3年《洪北江先生全集》八十四册、宣统3年《文征明甫田集》十二册，其钤印只有一种：“齐安林氏逸圣所藏金石书画记”。林逸圣为国民党高级军官，辛亥年作为学生军加入革命军，1926年北伐时期任第七军指挥部参谋长，1948年升任华中军委会总部政委会秘书长，1949年移居香港，受委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顾问，驻港服务，直至1967年逝世。（刘绍唐，2017）

最后是《性相通说》所钤印“曾藏袁文蕪家”。袁文蕪在清末与鲁迅兄弟一同留学于日本，鲁迅《呐喊》自序提及在日本时云：“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这里的“几个同志”，曹聚仁（2004：288）云：“鲁迅来到东京，决心要做文学运动先来出一本杂志，定名叫作《新生》。他拉到了两个同乡好友，给《新生》写文章，一个是许季弗，一个是袁文蕪。（袁后来到英国留学了。）袁与鲁迅很是要好，至少关于办新杂志谈得很投合罢，可是离开了东京之后，就永无音信。”这部书乃1961年由杨大省捐赠给马大图书馆。

六、结语

新马社会之大环境，尤其顾及历年官方对于中文系的态度，图书馆内入藏一批中文古籍已属难得，遑论是一批数量与质量均颇可观的中文古籍。上文提出正是1953-1954年与1960年代中期的分别两次特殊机遇，更是当时人之慧眼卓识以把握时机，如此时局与人事的完美结合才成就了这一笔特藏。唯其如此，方可理解当初这批中文古籍入藏之缘起，乃至昙花般盛况后之冷落与凋零；而尤以马来亚大学为甚。

当下这批幸存的古籍虽有几部珍本，当然是远不及当年海外“第七把交椅”之万分之一；惟有书叶间旧藏家之钤印还略可领会当初购书人之用心经营，亦当是形势下之慰藉。张元济曾慨云：“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张树年、张人凤编，1997：1123）此书籍之以继往开来，人世则以守先待后。

奈何仅隔半世纪，馆内记录荡然无存，甚且人事全非，浑无华胥之梦觉者，安得孟元老以“谈及曩昔”。是以考镜前事，索其源流，俾得足征。

此中特别值得提的是王遵侗以其时坚，购置中文古籍尚成如此规模，陈启云称之为“筚路蓝缕以启先河”，此话不虚；只是其“先河”早作涸泽。如今展阅那一方一方钤印讲究而严谨的“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思及当年韶宋楼陆树声在“岛田登楼观书后，预知此楼书必将出售，与管家人李延适合作，在所有秘本上均盖上‘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等章（参看徐雁，2019：85-97）；虽异时异地，性质也稍异，然爱物之心则同，何况于时下景况，若不着意加护保养，想武康山之昼鬼亦当以同哭。

杜定友（2019：266）历数古今书厄，总结云：“水火蠹鱼之害、兵戈盗劫之灾，纪不胜数，是因灾祸之来，不可避免。而历来藏书之不得其法，亦无可辞其咎焉。”纵如天灾不可免，然被水火犹“恬然不问”，至以“目不识丁”乃任之“杨笥凝尘，脉望果腹”，又岂止是“藏书之不得其法”而已。

至如后期钤印之“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覆盖于原藏书章上，与之“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横贯于书名叶中，直是“美人黔目，昔贤所讥；佛头着粪，终为不洁”，叶德辉（2005：53）慨称：“此岂白璧之微瑕，实为秦火之余厄！”

参考文献

- Anglo-Chinese School Ipoh 1949. *The Voyager 1949*, Ipoh: Anglo-Chinese School.
- Berkeley Library 2019. *The Ho-Chiang Collection of Buddhist Sutras*, <https://guides.lib.berkeley.edu/c.php?g=351532&p=2371564>, 26th June, 12:24pm.
- 蔡登山，2018，《多少楼台烟雨中：近代史料拾遗》，香港：新锐文创。
- 曹聚仁，2004，《鲁迅评传》，台北：新视野图书。
- 陈冠如，2009，《台湾音乐活动断代之研究：1960至1969年》，台北：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硕士论文。
- 陈怀宇，2015，〈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第1期，页69-84。

陈永正, 1994, 《岭南书法史》,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Cheong, Hock Hai 1954. *How to make best use of University's Chinese library*. The Straits Times, 24th November, pp.6.

杜定友, 2019, 《校讎新义》, 台北: 中华书局。

反町茂雄, 1979, 《蒐书人、业界、业界人》, 东京: 八木书店。

飞力, 1953, 〈响应创办马华大学〉, 《南洋商报》, 1月27日, 10版〈副刊〉。

高平, 2017, 〈日本近代咏诗诗的三个文明世界〉,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47卷第6期, 页167-180。

郭明芳, 2017, 〈严文郁与广东姚氏蒲坂书藏——记蒲坂书藏售书史料一则〉, 《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刊》, 第16期, 页24-28。

郭明芳, 2018, 〈从哈佛燕京馆藏零种《辍耕录》版印时间判定说起——兼谈清初汲古阁《津逮秘书》与《文选》书版流向〉, 《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刊》, 第26期, 页34-47。

何丙郁, 2006, 《学思历程的回忆》, 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胡颂平, 2015. 《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补编》, 台北: 联经出版社。

胡文辉, 2012, 〈现代学人涉嫌剿袭举例〉, 胡文辉著, 《洛城论学集》,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页145-162。

华勒, 1963, 〈新加坡大学图书馆〉, 《南洋商报》, 5月11日, 19版〈新加坡新闻〉。

Ho, K C 1954. *University's library will be one of the world's finest*, The Straits Times, 16th November, pp.6.

黄兆杰, 1981, 〈从历史观点看科学: 与何丙郁教授一席谈〉, 《交流——港大校讯》, 第33期, 页1-2。

Iwabuchi Sachiko 2019. *Okinawa Special Collection: Sakamaki-Hawley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Library Website, https://guides.library.manoa.hawaii.edu/okinawa_special_collections/SakamakiHawley, 2nd April, 2:14pm.

洁芳, 1962, 〈我对马大中文系的管见〉, 《南洋商报》, 7月29日, 4版〈副刊〉。

金榜居士, 1953, 〈马大中文系门庭冷落〉, 《南洋商报》, 10月17日, 10版〈副刊〉。

康如也, 1953, 〈关于马大的中文系〉, 新加坡: 《南洋商报》, 5月7日, 12版〈副刊〉。

李国庆, 2018, 〈老学斋藏书西传考〉, 《图书馆杂志》, 第8期, 页107-114。

李若莲, 1956, 〈中华文化教育的当前课题(上)〉, 《南洋商报》, 10月19日, 8版〈商余〉。

李微尘, 1954, 〈一个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问题, 由马大购运中文图书的报道说起〉, 《南洋商报》, 11月25日, 5版〈本坡〉。

力钧, 1899, 《槟榔屿志略》, 双镜庐集字板排印。

梁启超, 1998, 《清代学术概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林博爱, 1939, 《南洋名人集传(第四册)》, 槟城: 南洋民史编纂所。

林鸿图, 1971, 〈星大中文图书馆藏书的特色〉, 《星洲日报》, 1月1日, 44版〈新年特刊〉。

林徐典, 1967, 〈星加坡大学中文系简介〉, 《星洲日报》, 1月1日, 7版〈新年特刊〉。

林逸, 1953, 〈初中教员就够了〉, 《南洋商报》, 4月30日, 10版〈副刊〉。

刘崇稜, 2003, 《日本文学史》, 台北: 五南图书。

刘善庆, 1964, 〈王遵何女士对记者谈马大中文图书馆〉, 《南洋商报》, 2月4日, 10版〈全国新闻〉。

刘绍唐, 2017, 〈林逸圣(1897-1967)〉, 刘绍唐著, 《民国人物小传(第16册)》, 上海: 三联书局, 页129-135。

- 刘泽光, 2013, 〈汉隶为本、碑贴兼容——韩云山的书法艺术〉,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编, 《香港视觉艺术年鉴2013》,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页64-94。
- 罗乐然, 2018, 〈文化南来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形塑——以香港大学与马大(新大)中文系关系为研究个案〉, 《教育学报》, 第14卷第3期, 页111-119。
- 卢伟, 2011, 〈美国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概况——以宋元版为主〉,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1期, 页21-37。
- 马俊武, 1952, 〈南洋教育文化的展望(四)〉, 《南洋商报》, 10月25日, 9版〈副刊〉。
- 孟原召, 2006, 〈曹昭《格古要论》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的比较〉, 《故宫博物院院刊》, 第6期, 页81-94。
- 南东求, 2011, 〈中医史学家谢观与《中国医学源流论》〉, 《黄冈技术学院学报》, 第13卷第6期, 页86-89。
- 南洋商报, 1950,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出路不成问题, 建设图书馆积极筹备中〉, 《南洋商报》, 4月29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1, 〈马大中国文学系明年开设, 中文图书馆亦将设立〉, 《南洋商报》, 5月20日, 5版〈星期刊〉。
- 南洋商报, 1953a, 〈论马华大学须提前创办〉, 《南洋商报》, 1月3日, 1版〈评论〉。
- 南洋商报, 1953b,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南洋商报》, 1月13日, 1版〈评论〉。
- 南洋商报, 1953c,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聘贺光中博士主持, 职位为高级讲师〉, 《南洋商报》, 4月25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3d, 〈马来亚大学新山新校舍建筑费需一亿余元〉, 《南洋商报》, 6月19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3e,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将不收外间新生, 代主任贺光中赴港日购书籍〉, 《南洋商报》, 8月29日, 7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3f, 〈贺光中博士回星代马大购书约共二十万元〉, 《南洋商报》, 10月9日, 6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3g, 〈马大图书馆隆重开幕, 陈六使主持剪彩〉, 《南洋商报》, 10月11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3h,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新生只有一人〉, 《南洋商报》, 10月13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3i, 〈马来亚大学图书馆购置中文图书〉, 《南洋商报》, 10月16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3j, 〈马大新购中文图书首批三十六箱已运到, 尚有一百五十九箱将自日本运来〉, 《南洋商报》, 11.7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3k, 〈贺光中将演讲马大中文藏书〉, 《南洋商报》, 11月30日, 6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4a, 〈星洲吉隆坡两地拟分设马来亚大学各学院〉, 《南洋商报》, 6月10日, 6版〈本埠新闻〉。
- 南洋商报, 1954b, 〈马大新聘讲师多名, 周辨明博士任中文讲师〉, 《南洋商报》, 10月17日, 6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4c, 〈马大图书馆可否开放给大众, 将由图书馆委员会考虑〉, 《南洋商报》, 11月25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5a, 〈南洋大学积极进行购置图书〉, 《南洋商报》, 2月3日, 5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5b, 〈马来亚大学年内开始扩建一千一百万元大工程, 隆坡分校消脂一决定即进行五百万元工程〉, 《南洋商报》, 7月28日, 5版〈新加坡〉。
- 南洋商报, 1955c, 〈全马各地图书馆代表大会, 检讨两年来工作概况〉, 《南洋商报》, 9月19日, 9版〈马来亚〉。

- 南洋商报, 1957a, 〈马大中文藏书十余万册, 编成目录三巨册〉, 《南洋商报》, 1月5日, 7版〈新加坡〉。
- 南洋商报, 1957b, 〈马大中文图书馆应开放〉, 《南洋商报》, 1月16日, 2版〈社论〉。
- 南洋商报, 1957c, 〈马大副校长奥本馨播讲马大文科一年级迁隆计划, 定本年九月起开始上课〉, 《南洋商报》, 5月31日, 5版〈新加坡〉。
- 南洋商报, 1957d, 〈马来亚大学校长麦唐纳自印来星, 今日飞隆主持分校开学礼〉, 《南洋商报》, 9月21日, 5版〈新加坡〉。
- 南洋商报, 1958a, 〈联合邦教育政策不应因政权更易而改变, 否则将引致混乱〉, 《南洋商报》, 6月27日, 9版〈马来亚〉。
- 南洋商报, 1958b, 〈星马两教育部长谈商马大组织问题, 详情将于廿七日公布〉, 《南洋商报》, 8月23日, 9版〈马来亚〉。
- 南洋商报, 1959a, 〈新加坡、吉隆坡马大设立日期定本月十五日〉, 《南洋商报》, 1月10日, 7版〈新加坡〉。
- 南洋商报, 1959b, 〈南洋大学图书馆报告中西文图书近十万本, 尚不能满足教职员学生需求〉, 《南洋商报》, 2月20日, 6版〈本坡〉。
- 南洋商报, 1959c, 〈隆马大图书馆征聘工作人员〉, 《南洋商报》, 11月7日, 11版〈马来亚〉。
- 南洋商报, 1962a, 〈隆马大将择日庆祝成为马来亚大学, 庆祝日期尚待商讨〉, 《星洲日报》, 1月7日, 10版〈南洋新闻〉。
- 南洋商报, 1962b, 〈马大中文系五月间开课, 敦聘郑德坤为主任〉, 《南洋商报》, 1月25日, 9版〈马来亚新闻〉。
- 南洋商报, 1962c, 〈马大副校长昨飞星, 出席会议前谈增设中文系在进行中〉, 《南洋商报》, 2月24日, 9版〈马来亚新闻〉。
- 南洋商报, 1962d, 〈中文系教授郑德坤博士由剑桥大学借用〉, 《南洋商报》, 6月16日, 19版〈特刊〉。
- 南洋商报, 1962e, 〈郑德坤博士抵马主持马大中文系, 明年正月仍回剑大〉, 《南洋商报》, 7月7日, 9版〈马来亚新闻〉。
- 南洋商报, 1962f, 〈马大中文系主任郑德坤博士访槟, 畅谈马大中文系办理方针〉, 《南洋商报》, 9月4日, 15〈全国新闻〉。
- 南洋商报, 1962g, 〈星马两大学联络委员会昨日在槟举行会议, 接受温文旦后嗣赠藏书〉, 《南洋商报》, 10月14日, 6版〈马来亚〉。
- 南洋商报, 1962h, 〈马大中文系主任郑德坤提出十年发展计划〉, 《南洋商报》, 12月29日, 12版〈全国新闻〉。
- 南洋商报, 1964, 〈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明年扩建为五层楼, 可容六十四万五千本书〉, 《南洋商报》, 2月11日, 10版〈全国新闻〉。
- 南洋商报, 1966, 〈已故许绍南藏书赠送新大图书馆〉, 《南洋商报》, 10月18日, 17版〈新加坡新闻〉。
- 南洋商报, 1971, 〈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度藏图书近四十万册, 订购各国杂志六千种〉, 《南洋商报》, 10月11日, 5版〈马来西亚新闻〉。
- 南洋商报, 2014, 〈52年前芭尾火灾重建地段, 地契注册中华公会名下〉, 《南洋商报》, 2月12日, 9版〈地方〉。
- 潘林编注, 2014, 《张居正奏疏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潘建国, 2003, 〈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所藏通俗小说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页65-71。
- 钱穆, 1956, 〈我来马大中文系讲学后之感想〉, 《南洋商报》, 6月10日, 6版〈星期刊〉。

- 钱穆, 2005,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上海: 三联书店。
- 清华大学图书馆编, 2003,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沉迦, 2009, 〈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 《藏书家》, 第15辑, 页171-187。
- 蜀人, 1956, 〈百万华人岂止无一图书馆〉, 《南洋商报》, 7月3日, 7版〈商余〉。
- 书生, 1956, 〈百万华人无一图书馆〉, 《南洋商报》, 6月9日, 14版〈副刊〉。
- 宋燕鹏, 2013a, 〈马来亚大学与《古今图书集成》——马大中文线装书历史随谈之一〉, 《星洲日报》, 10月20日, 7版〈新教育副刊〉。
- 宋燕鹏, 2013b, 〈不应被遗忘的檳城闻人温文旦先生——马大中文线装书历史随谈之二〉, 《星洲日报》, 12月31日, 7版〈新教育副刊〉。
- 宋燕鹏, 2014, 〈文学史之外的何克柔——马来亚大学中文线装书随谈〉, 《光华日报》, 2月11日, 8版〈文艺光华〉。
- 宋燕鹏, 2015, 《马来西亚华人史: 权威、社群与信仰》,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 苏莹辉, 2016, 〈东南亚的汉学研究〉, 《海外汉学通讯社》, 网址: <https://site.douban.com/124176/widget/forum/4807474/discussion/614039843/>, 8月28日, 12:27am。
- The Straits Times 1954. *Booty smuggled out of China*. The Straits Times, 13th November, pp.2.
- The Straits Times 1957a. *New Chinese literary guide boost for S'pore*, The Straits Times, 9th January, pp.6.
- The Straits Times 1957b. *A \$10,000 book collection for the Nanyang*. The Straits Times, 31st May, pp.5.
- 孙浩宇, 2016, 〈清末《盛京时报》刊载日人汉诗考〉, 《社会科学战线》, 第11期, 页166-175。
- van Gulik, Robert 1960. In memoriam. Frank Hawley(1906-1961), *Momenta Nipponica*, 16.3:434-447.
- 王桂云, 2012, 〈寓青的巨奸王克敏〉, 《辛亥革命》, 网址: <http://www.xhgmw.com/html/gonghewenhua/zhengzhi/2014/0716/7058.html>, 10月12日, 12:00am。
- 王建亮编辑, 2016, 〈听雨楼忆八叔〉, 《中华网》, 网址: <https://3g.china.com/act/culture/11170626/20160529/22761553.html>, 5月29日, 12:14pm。
- 王如明主编, 2015, 《南洋大学文献》, 新加坡: 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 王世伟等编, 2001,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录》,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 王仲厚, 1951, 〈贡献于马大中国图书馆者〉, 《南洋商报》, 7月8日, 2版〈星期论文〉。
- 王仲厚, 1953, 〈漫谈中国图书〉(一)(二)(三)(四), 《南洋商报》, 3月12、14、16、18日, 11版〈副刊〉。
- 文学城, 2017, 〈中华奇女子, 逃到香港, 宣布与汉奸父亲绝交, 现在却少为人知〉, 《文学城》, 网址: <http://zh.wenxuecity.com/bbs/memory/1165895.html>, 9月18日, 4:21pm。
- 吴志良、杨允中编, 2005, 《澳门百科全书》, 澳门: 澳门基金会。
- 萧遥天, 1979, 《食风楼诗存》, 檳城: 天风出版公司。
- 星檳日报, 1962, 〈捐赠马大中文系温文旦藏书目录〉, 《星檳日报》, 10月13日, 10版〈地方新闻〉。
- 星洲日报, 1953, 〈马大新图书馆开幕盛典, 麦唐纳誉陈六使为当地伟大公民〉, 《星洲日报》, 10月11日, 5版〈星期刊〉。
- 星洲日报, 1954, 〈南大图书馆长严文郁抵星〉, 《星洲日报》, 12月31日, 5版〈本埠新闻〉。
- 星洲日报, 1955, 〈南大图书馆加紧建筑中, 购书计划拟就〉, 《星洲日报》, 2月3日, 5版〈本埠新闻〉。
- 星洲日报, 1956, 〈南洋大学图书馆藏书多已运抵, 图书馆主任王咏祥氏从事整理工作之情形〉, 《星洲日报》, 3月20日, 5版〈本坡〉。

星洲日报, 1958, 〈隆马大分校文学院学生, 反对明年在隆上课〉, 《星洲日报》, 4月2日, 11版〈南洋新闻〉。

徐雁, 2019, 《越踪集》,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许振兴, 2005, 〈北学南移与香港大学〉, 鲍绍霖等主编, 《北学南移: 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 台北: 秀威资讯出版, 页175-185。

叶德辉, 2005, 《藏书十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树年、张人凤编, 1997,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振炎, 1953, 〈关于马大设立中文系〉, 《星洲日报》, 6月20日, 11版〈副刊〉。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 2009,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 北京: 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欣平, 2012, 〈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形象史学研究》, 第2期, 页257-267。

周一良, 1998, 《毕竟是书生》,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庄康, 1956, 〈百万华人何不创立一图书馆〉, 《南洋商报》, 6月18日, 7版〈商余〉。

附录: 马来亚大学藏中文古籍钤印列表²⁹

序号	书名	藏家私章	藏书者	马大入藏公章
1	《春秋左传》	鉴古堂温氏藏本	温文旦	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蓝)
		檳城温氏藏书		
		陶然楼主		
		墨磨人	?	
2	《三山同声集》	鉴古堂温氏藏本	温文旦	/
		轩举过目	力钧	
3	《澹靜斋说课》	轩举过目	力钧	/
4	《宜稼堂丛书》	瑞安孙氏逊学斋藏书记	孙衣言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蓝)
		中容点勘	孙诒让	
5	《当归草堂丛书》	保泰持盈	陈庆保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哲如陈庆保藏书		
		敬慎寡过, 明哲保身		
		喆如		
6	《王子安集注》	哲如陈庆保藏书	陈庆保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陈庆保		
		萧山范氏藏	?	
7	《适园藏书志》	陈庆保	陈庆保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东官莫氏五十万卷楼	莫伯骥	
8	《翠薇山房全书》	番禺陈绳斋藏弃图书	陈绳斋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蓝)

²⁹ 表中使用符号说明如下: 一、印章栏内“○”符号表示印章中的某字无法辨认; 二、藏书者栏内“?”符号表示该印章主人姓名无法确认, 当中主要是日本藏书者姓名; 三、马大印章栏内“/”符号表示该书中无马大图书馆公章。

9	《东西洋考》	子孙永保 / 云烟家藏书记	安西云烟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松菊莊文库	？	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蓝）
10	《洪北江先生全集》	齐安林氏逸圣所藏金石书画记	林逸圣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11	《文心雕龙》	潜江邹氏藏书	？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12	《泰山志》	蓄堂游清所获	结城蓄堂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13	《隶篇》	望江史氏松泉所藏书画之印	史松泉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14	《大学衍义补》	王嘉祚印	王嘉祚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15	《御制仪象考成》	朽木轩藏书印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16	《衡斋算学遗书合刻》	唐学斋	吉川幸次郎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17	《江陵张文忠公全集》	清光绪时武进谢钟英先生手批书籍	谢钟英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东山后裔		
		澄翁六十后怡得记		
		清光绪武进谢钟英先生之手书也		
		澂斋藏书	谢利恒	
		民国廿八年武进谢利恒先生装订之		
		中华武进谢利恒校读之记		
民国廿八年武进谢利恒重装校读记				
18	《鸿桷堂诗文集》	马鉴之印	马鉴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19	《诸史然疑校订附引得》	季明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20	《月河精舍丛钞》	鄞马鉴季明藏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马鉴之印		
21	《山谷集》	鄞马鉴季明藏	李思浩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马氏老学斋劫余文物		
		马鉴		
		慈溪李思浩秘笈之印		

22	《皇清经世文续编》	马鉴之印	马鉴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含英咀华	?	
23	《宋本唐人小集》	鄞马鉴季明藏	马鉴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为春室所藏图书（白文）	?	
24	《稽古录》	唐	唐祖振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园		
25	《钦定授时通考》	山田藏书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宜秋馆藏书	李之鼎	
26	《安吴四种》	碧云仙馆	潘成谷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3 Nov 1953
27	《博物典汇》	安藤氏宝库之章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戴金图书		
		长门国北条氏		
28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古杭邵章倬庵藏书记	邵章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29	《练兵实纪》	本山文库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30	《博物要览》	有水可渔	幸田露伴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蝸牛庵		
31	《格致镜原》	庆应义塾图书馆印	庆应义塾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宝玲文库	Frank Hawley	
		集义斋	高罗佩	
		高罗佩藏		
32	《功顺堂丛书》	韞岑藏书	高学廉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33	《兩汉金石记》	韞岑藏书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澄海高氏经籍记		
		澄海高氏玉笥山楼藏书之章		
		嶺东高氏玉笥山楼图书		
34	《兩罍轩彝器图释》	高氏收藏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韞岑秘笈		
		高氏家藏		
35	《岳雪楼书画录》	秋晓庵印	潘仪增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36	《藏书纪事诗》	庆应义塾图书馆印	庆应义塾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宝玲文库	Frank Hawley	
37	《五灯会元》	妙吉羊	江淑娴	/
38	《老子翼》	紫砚楼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39	《庄子集释》			
40	《庄子因》	草场藏书之印	草场佩川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41	《史外》	白榆楼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42	《宋王復斋钟鼎款识》	向黄春宝藏印	向山荣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三十五志山房	中川小十郎	
		中川氏藏		
		先种庐珍藏	？	
		熊		
43	《孙溪朱氏金石丛书》	槐庐主人 孙溪槐庐主人	朱记荣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44	《河洛精蕴》	佐藤氏藏	？	/
		佐藤文库		
		内田文库	内田天正堂	
		天正堂内田氏藏书印		
45	《宋版书经》	松井藏书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巢云		
		新免古香旧藏，大正己未归于下乡向阳		
		古香草堂		
		玉润堂印		
		汤浅氏图书记		
46	《弘正四杰诗集》	槐南诗精	森槐南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47	《古诗源》	伍耀光印（白文）	伍耀光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3 Nov 1953
		翰良		
48	《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	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	吴引孙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曾在依云楼	韓云山	
		云山		
		汪希文印	汪希文	

49	《梅窩词钞》	叶大綽	叶大綽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3 Nov 1953
50	《酉阳杂俎》	补拙斋	叶大綽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佰〇藏书	？	
51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	吐纳庵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52	《东华录》	中山氏藏书之记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望月藏禁门外		
		温故堂		
53	《长安宫词》	小延年室	南通黄氏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4	《智囊》	樱山文库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55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方树福堂敬赠	方树泉	/
56	《圣武记》	棣庵	夏偕复	/
		〇室	？	
57	《国朝学案小识》	湖村小隐	？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58	《新增格古要论》	山阴杜氏知圣教斋藏书	杜煦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会稽梁氏珍藏书画印	？	
59	《芥子园画传》	李鹿洞画	？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李〇〇		
60	《古学千金谱》	无碍道人藏书	今泉雄作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无碍庵		
		也轩读本		
		大空长物	？	
		拙诚堂藏书印		
		李氏家藏		
61	《增广诗韵全璧》	镇安	？	/
62	《六书正讹》	桂窗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63	《金罍子》	古润陈氏藏书	？	/
		石湖诗孙	范志熙	/
		木樨香馆范氏藏书		
64	《阙里志》	〇山堂藏书〇	？	/
		〇尾堂图书印		

65	《星经》[手抄本]	平田氏记	?	/
66	《三台万福通书大全》	文治堂藏书	大熊光山	【书末题“大熊光山藏”】
		光		
		光山文库		
		大熊之印		
67	《古书隐楼藏书》	无上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68	《性相通说》	曾藏袁文薮家	袁文薮	【纪念演本法师弘法南溟 / 马来亚大学图书馆惠存 / 杨大省敬赠, 一九六一年五月廿九日】
69	《兩浙金石志》	慎思明辨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70	《路史》	勿来庵藏	?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 Singapore 12 Sep 1955
71	《刘向说苑纂注》	长善馆藏书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72	《六祖坛经》	释融熙	融熙	/
73	《明文征仲书赤壁赋真迹》	融熙		/
74	《硕果社第五集》	唯庵	吴肇钟	【Gift: Mr Van Thean Kee / 5.11.1964】
75	《硕果社第五集》	景康	李凤坡	【Mr Van】
76	《首楞严经疏》	融秋	融秋	【Mr Van】
77	《毛诗品物图考》	月冷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月冷藏书之印		
78	《社盟算谱》	竹内藏书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79	《五明算法》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80	《神器谱》	山口氏藏书记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汉〇藏书	?	
81	《授时历图解》	越后国颈城郡国贺村饶村宏熙图书之印	?	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印(朱)
		石〇审定	?	

82	《妙法莲华经》	惠州归善县陈森源圆密居士敬送 永存云峰常住	陈森源	【Mr Van】
83	《缩临古本论语集解》	福喜寿〇藏书印	?	马来亚大学中文 图书馆印（朱）
		诚		
		生田		
84	《四书图考》	闻喜堂	?	/
85	《蟬史》	王志明	?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王氏静安藏书		
		静庵		
86	《玉篇》	荻野藏	?	/
87	《刘氏聚学轩重刊金石 图说》	聚学轩	刘世珩	马来亚大学中文 图书馆印（朱）
		至诚堂坐右章	松浦厚	